

主管单位：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主管单位：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编辑部
编辑部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 84 号
出版日期：2025 年 10 月
电 话：(029) 83690153
邮 编：710061
电子邮箱：sxsyxb@ 126. com

2025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目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起、何以、何为
..... 高文浩（5）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优势、内在机理与提升路径研究
..... 俞好爱 范晨铭（11）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政引领路径与体系研究
..... 乔彩燕 肖 静 熊成帅（17）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生成逻辑、独特优势和经验启示
..... 宋鑫华 周玉琴（22）

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生成逻辑、价值逻辑与实践逻辑
..... 令小雄 丁佳雪（27）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实践要求与路径探析 刘小蒙（33）

期刊基本参数：

CN61-1321/D * 1992 * A4 * 64 * zh * P * ￥7.50 * 2000 * 13 * 2025-04

党史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载体运用效果及当代启示
..... 张静月 宫玉涛 (38)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的三维阐释 刘宇超 徐 渊 (44)

观察与思考

“治理有效”目标下非正式制度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探析
..... 卞 辉 张亚茹 (50)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赵丽维 (56)

推动宝鸡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多维思考
——基于文化生态、产业融合与科技赋能等视角
..... 韩 颖 (60)

声 明

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凡是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都将自动进入以上电子出版物，本刊所付稿酬已包含各种电子出版物及网上服务的报酬，不另计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本刊顾问

崔 歆 周 静 袁炜伟 朱 丽

编辑委员会

袁炜伟 燕连福 苏玉波 陈晓莉
何 诚 张 涛 尹夏清 王西军
张 玮

主 编：袁炜伟

执行主编：张 玮

编辑部主任：王目星

责 任 编 辑：蒙晓哲 王晓璿
黄晓翠 唐 倩
马文婷 李 蕾
张嘉瑶 刘 悦
龚 苏 程凯丽
章雅昭 宋帅华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何起、何以、何为

高文浩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的逻辑关系，两者构成了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并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阐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要点，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点”、文明传承“线”、工作覆盖“面”和文化生命“体”，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规律。在强国新征程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从借助文化遗产、提升宣介能力、注重教育引导和丰富载体形式出发，全面畅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为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和文化基础。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D633; 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5) 04-0005-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1]，彰显了文化在夯实民族团结之基、铸就民族和睦之魂中的突出价值，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启示。在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党中央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并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决策部署，有利于构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文化进路，对各民族凝心聚力、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何起：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成果，在理论维度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历史维度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在现实维度聚焦于民族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正确把握民

收稿日期：2025-09-15

基金项目：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乡村绿色低碳发展的保障机制研究”(22YJA710012)；黑龙江省2023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研究”(SJGSX2023019)；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思政课“生态文明教育实践”研究专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课生态文明教育专题式教学实践研究”(DLJSSZK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文浩，男，东北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族发展规律,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 理论渊源: 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守正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以“三个共同体”理念进行了反映时代特征的创新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中华民族是和谐团结的“平等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2],意在说明各民族均有其优秀之处。鉴于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指出“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3],充分肯定了各民族在创造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的平等地位,体现了党在民族关系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继承。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中华民族是包容互鉴的“文明共同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的普遍联系,使各民族在文化的交流借鉴中主动或被动融入“联合体”。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样重视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的历史价值,将“五个共同”所融汇的民族史实看作是各民族文化创造、滋养中华文化的事实依据,强调正是“中华文化认同……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4]。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中华民族是命运与共的“发展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5],将建立和谐共荣的利益共同体看作是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的重要前提。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6],以此推动中华儿女人心归附、精神相依,从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团结奋斗。

(二) 历史赓续: 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精髓要义和

传承发展理念,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传承发展、传承发展什么和如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之问。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儿女最深层的情感,熔铸在血脉之中并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为中华儿女的团结一心提供了血脉相连的文化纽带。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化滋养。如习近平文化思想吸收发展了“求大同”的哲学思想,提炼出协商民主的政治理念;传承弘扬了“六合同风”的思想观点,彰显出中华儿女团结统一的价值认同等。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方针,为以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科学指引。“创造性转化”注重在保留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其形式、功能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例如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通过VR沉浸式展览重新演绎,使人们身临其境感受“江山一统”的壮阔历史。“创新性发展”注重通过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实现文化的新范式创造,例如开发融合故宫文化元素的全品类文具,让“大一统”的历史记忆融入日常生活。

(三) 现实观照: 是维护民族团结、凝聚复兴伟力的需要

如何在新时代激荡的文化思潮中保持自身定力,凝聚起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着眼点。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围绕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交流碰撞加剧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民族领域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我们同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民族问题上斗争的前哨战,这场斗争依然尖

锐复杂”^[7]，部分西方国家想方设法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将各民族人民的人心与力量凝聚合一，汇聚民族复兴伟力的需求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着眼于应对民族领域纷繁复杂的文化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以先进的思想文化为引领，振奋民族精神、激发前进动力”^[8]。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观点，并应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实践，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9]，并以“七个着力”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目标和实践方法，目的在于确保党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主动权，以此发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中的主心骨作用，从而能够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有效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朝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断迈进。

二、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支点

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文化自信自立自强的高度，科学解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规律，通过文化自信论、文化使命论、文化建设和两个结合论，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文明基础、工作布局和主体支撑，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支点。

（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文化认同“点”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10]正确把握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有助于强化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一，坚定在悠久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在长期融合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共有文化蕴含了各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层而持久的驱动

力，成为了中华文明不曾间断、薪火代代相传的底气所在、根基所在，使各族人民互嵌共生、团结一心，共同追求美好生活。其二，坚定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凭借伟大建党精神等一系列中华民族精神凝聚起各族人民文化自信的共识。在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凸显的当下，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凝心铸魂，始终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五史”教育、实施文明创建和公民道德建设等工程，不断提振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其三，坚定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文化自信。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的各民族交流互鉴，使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塑造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和高度自觉的文化认同。面对当今“古今中西”的时代之问，坚定文化自信有助于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推动各民族之间你来我往的良性互动，延续中华文化自古以来的开放姿态和包容胸怀，共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编织文明传承“线”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1]。这一文化使命顺应了中华民族从过去走向未来、从多元聚为一体的发展态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赓续了文明生成、延续和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一方面，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时代需要，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绵延发展的文明共同体。中华文明作为理解新的文化使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钥匙，其连续性维系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与根系，创新性培育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统一性增进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家国情怀，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平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和合理念。因此，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助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12]。另一方面,新的文化使命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现代到未来的自觉发展。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的需要作出的科学回答,代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更高层次的内容表达与精神标识。这一文化使命明确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共同的理想追求,激励着各族儿女自觉担负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责任,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再续融合。

(三)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扩大文化覆盖“面”

“如果忽视思想工作,反而可能会出现越是生活环境变好,越是跟中华民族共同体疏远的消极心理。”^[13]习近平文化思想针对性地提出了“七个着力”重大要求,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意义。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政治要求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首位。一是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通过强化意识形态引领等方式,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二是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确了民族工作“坚持以什么为指导”“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问题,有助于推动民族团结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精华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支撑。一是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形塑各族群众的自觉认同和具象化行为,不断提升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在赓续中华文脉中增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创造有利文化条件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抓手。一是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以新闻舆论的“四力”提升

来构建主流话语的“同心圆”,着力打造传播—认同—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养成机制。二是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通过建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服务体系,以市场化、科技化的手段将中华文化融入各族人民日常生活,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体验中深化“四个共同”的认知。三是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对象化阐释、国际化表达,在对外传播中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构建全球话语权和民族向心力,进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四)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文化生命“体”

经由“两个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赋予了文化的生命体属性,也为具有突出思想文化标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成长依托。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因“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4]而具有鲜明的文化主体性,因“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15]而具有文化多样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了“多元”滋养“一体”、“一体”保障“多元”的良性循环。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主体性赋予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力量。回溯历史,面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通过动摇中华文化主体地位来实现其殖民统治的图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反帝”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以“反封建”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在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中,中华儿女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等一系列伟大斗争,“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16]。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多样性承载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支点。新的文化生命体内蕴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具有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精神特质。在这其中,新的文化生命体坚持每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地位,强调不同民族文化无“高低优劣”之分,旨在秉持平等团结理念推动各民族的交流互鉴和共同进步。作为一种超越资本逻辑并指向未来的

具有世界意义的开创性文明，新的文化生命体提出了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主体共存、共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议，有助于广泛凝聚全人类的价值共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繁荣、和平、包容、有序的世界格局。

三、何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落点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此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从文化遗产利用、宣介能力提升、注重教育引导、丰富载体形式等方面入手，全面畅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一）借助文化遗产，构筑“古”与“今”贯通的历史文化纽带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承载着“我们何而来”的集体记忆，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层文化支撑。其一，要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在历史记忆共情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体责任，理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切实增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权威性、协同性和约束力，为中国各族人民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载体。其二，要加强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和阐释，在文化情感共鸣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文化遗产提供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价值，离不开“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17]。因此，要以多元视角探索文化遗产背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通过考古实证、文献互证的方式“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学理基础。其三，要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在经济利益共享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文化遗产融入文化与旅游的双向互动，有助于“把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入旅游经济发展之中，使旅游成为宣传灿烂文明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窗口”。^[18]

（二）提升宣介能力，讲好“中”与“外”相通的民族团结故事

习近平提出“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在宣传领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明确要求。一方面，要推动传播手段更新。掌握信息化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舆论主导权，必须“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20]。因此，既要发挥传统媒体的权威引领作用，开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报道和政策解读，以更加通俗化的语言回应广泛的社会关切；又要发挥新媒体更高效、更具活力的优势，利用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打造“年轻化、互动化”的传播矩阵，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巩固和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舆论影响力。另一方面，要推动传播内容创新。传播内容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更是塑造价值认同、抵御极端思潮的重要工具。立足国内，传播内容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既要从中国优秀典籍中挖掘具有传播价值的民族团结故事，讲清楚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伟大祖国的历史；又要讲好当下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故事，以更具表现力的叙事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面向国际，传播内容要积极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频繁打出的“民族牌”“人权牌”，坚决回击西方在民族领域的抹黑攻击，借助主流媒体播出民族地区的介绍短片，充分展现各民族、各地区的自然风光和社会发展，通过积极主动展示立体、真实、全面的中国，坚决捍卫国际正义和国家形象。

（三）注重教育引导，推进“道”与“器”会通的认同教育建设

习近平强调：“加强民族团结，基础在于搞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21]一方面，发挥教育的引导作用，必须以“道”御“器”，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悠久历史，决定了解析中华民族历史不能套用西方民族理论。首先，在理论构建的方法论上，既要扎根历史传统，提炼中华文明中的教育资源，又要结合新时代民族工作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现实导向。其次,在理论构建的内容上,要明确“五个共同”的历史观、“四个与共”的价值观等,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内容支柱。最后,在理论构建的策略上,要聚焦教育浸润,通过合理规划课程设计、注重社会实践等措施,构建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发挥教育的引导作用,必须以“器”载“道”,借助教材等具象物质载体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教材承载着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是形塑受教育者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素。发挥教材引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要有意识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有机融入教材。首先,要提升教材编写的专业性。邀请民族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参与到相关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确保教材的政治立场坚定和正确。其次,要提升教材编写的思想性。要结合课程方案对知识片段进行合理选择,围绕共同的疆域、共同的历史等内容,对受教育者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价值观念引领,使受教育者认识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后,要提升教材编写的系统性。既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专业书籍的编写,也要在语文、政治等教材中有机融入中华民族历史源流的相关知识,引导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观,从而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合力。

(四) 丰富载体形式,打造“形”与“神”融通的文化认同媒介

习近平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要“有形、有感、有效”。“有形”是借助某种载体,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具象化为人们能够接触到的具体事物,“有感”强调精神与情感的认同与归属。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一是要建设主题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要着力建设民族团结纪念馆等民族团结主题的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在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馆中融入民族团结的主题展览,使各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熏陶和浸润。二是要创作展现中华民族形象的视觉文化产品。影视、综艺等视觉文化产品能通过其内容传

递更深层次的人文情“感”,引导人们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认同。因此,应紧紧围绕中华民族历史进行文化创作与改编,例如,《典籍里的中国》等综艺节目通过戏剧化演绎还原“文成公主进藏”等历史事件,凸显了民族交融的主题,推动了各民族共享共有精神文化符号的有形化、可视化和生活化。三是要提炼外在形式与精神内核深度融合的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在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创造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共享文化符号,发挥文化符号的现代价值,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与当代设计深度融合,既能够使文化符号承载历史厚重感、具备现代生命力,又能够在寻常生活中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29.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194.
- [3] [4] [6] [8] [9] [10] [14] [15] [17] [18] [19]
- [20] 习近平.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67, 67, 65, 13, 12, 43, 32, 32, 92, 94, 68, 77.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09.
- [7]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85.
- [1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0.
- [1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10-29 (01).
- [13] 王延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与重点任务 [EB/OL] (2024-01-2) [2025-4-12].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01/t20240102_434039.html.
- [16]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6.
- [21]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N]. 人民日报, 2018-03-06 (01).

责任编辑: 王晓璘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优势、 内在机理与提升路径研究

俞好爱 范晨铭

(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8)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安排,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供给”,在治理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展现出民主化治理的参与广度、科学化治理的决策深度与协同化治理的效能聚合优势,其通过政党结构整合政治资源、通力合作提升发展绩效、团结和谐塑造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实现治理效能增进。针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对我国国家治理形成的多重挑战,可以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提升主体能力、构建话语体系的三维路径,推动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关键词:国家治理 党的领导 多党合作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4-0011-06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可能性及其程度高低,关乎国家治理能力与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面临的重要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别是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是新时代政治领域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优势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与主导力量,始终致力于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结合国家治理中的一般原理与典型实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了政党引领国家治理的效能优势,表现为民主化、科学化与协同化的治理优势。

(一) 民主化治理: 政治参与的广度拓展

改革开放至今,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社

收稿日期: 2025-09-15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 2025 年招标课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效能研究”(kt2025011)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俞好爱,女,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基础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 统战理论政策、社会治理改革; 范晨铭,男,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基础理论教研部助理讲师,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学。

会各界表达利益诉求的愿望也愈发强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契合了政治参与扩大的国家治理需要。在这一制度框架下通过各民主党派深度、立体且广泛的政治参与，将分散的民意转化为系统化的政策输入，极大提升了治理过程的民主性与代表性。在国家事务的讨论与决策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够依托丰富的制度性平台开展参政议政，既可以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协商表达利益诉求，也能够借助人民政协这一重要平台参与政治协商^[3]。以人民政协为例，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它为各方面人士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无论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制定，还是地方发展规划的研讨，都能听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声音。在基层治理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同样发挥着促进政治参与的作用。

（二）科学化治理：政策决策的深度优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对知识精英的整合，依托制度性协商与专业论证，实现了政策制定的精准性与前瞻性，推动了科学化治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党协商这一重要形式，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重大方针政策等进行深入讨论。各民主党派汇聚了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他们能够从不同专业视角出发，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各民主党派提供专题研究报告 200 余份，涉及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分析，同时结合国际关系形势和国内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帮助政策制定者完善政策细节，确保政策能够切实推动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同时，专业论证贯穿于政策决策的各个环节。重大政策出台前，会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严谨论证，评估政策的可行性、预期效果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这种依托制度性协商与专业论证的决策模式，有效提升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充分展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提升治理效能中的理性决策能力。

（三）协同化治理：政党合力的效能聚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挑战增多，领域内容广泛，治理主体多元，现代国家治理应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更加强调治理系统的动态开放，促进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协同^[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通过政党间的协作联动与资源整合，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得到充分发挥，凸显出在统筹协调、高效执行方面的系统性优势^[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了党委领导、多党协同的治理架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够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在应对重大公共事项时，这种协同效应尤为明显。在北京冬奥会筹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统筹调配全国资源，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发挥自身优势。九三学社院士团队主导“低碳制冰技术”研发；致公党协助奥组委对接国际冰雪运动组织，化解外交沟通障碍；台盟组织两岸青年志愿者参与冬奥村文化展示；农工党成员组建了多语言医疗队服务外籍运动员。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进，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了治理效能，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协同化治理方面的巨大优势。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增进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

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上层建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指导下，形成了政党缔造国家，国家建设和发展实践催生政党制度的政党政治独特路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天然具有服务国家建设、促进国家发展的政治属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治理范式。

（一）政党结构整合国家治理的政治资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

主体积极参与的“一元多体”政党结构，各主体之间按照“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方式构建有序的国家治理格局。在国家治理中，执政党虽有不可替代的执政优势，却无法独占治理所需的全部资源、技术与知识。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多属中国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广泛分布于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6]。“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互动逻辑构建了政治资源的动态优化机制，各民主党派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对多元政治力量的高效整合能力，使政治资源始终在治理目标轨道上高效流动。从本质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结构将“整合力”与“活力”纳入同一制度框架。“一元”的领导核心确保政治资源整合的方向性与整体性，“多体”的协同参与保障政治资源供给的丰富性与专业性。这种结构既超越了单一政党可能出现的资源封闭，也避免了多党竞争导致的资源内耗，使分散的政治资源通过制度化渠道汇聚，最终实现政治资源向治理效能的高效转化，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优势。

（二）通力合作提升国家治理的发展绩效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建立了通力合作的友党关系，通过广泛的合作共事推进国家治理。在实践层面，它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路径，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政治协商通过共识凝聚促进了国家治理的善治效能。善治的核心在于实现“多元包容”与“高效决策”的平衡，而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协商机制恰好构建了这一平衡的实现路径。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制度化平台，各民主党派以参政党身份参与重大决策协商，这种“商量着办”的决策模式，在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形成了“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的良性互动关系，通过制度化协商实现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化。民主监督通过良性纠偏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科学化升级。当代国家治理的多元复杂性已超越单一政党在资源储备、

能力边界及知识体系上的承载限度。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间的民主监督并非西方那种权力制衡，而是各民主党派围绕共同政治目标，针对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治理决策展开合作式纠偏，从而整体提升和优化国家治理效能^[7]。参政议政通过政治吸纳促进了国家治理的政治平衡。政治平衡的核心在于社会力量能够影响国家治理的权力中心，让治理过程充分回应多元社会结构的利益诉求，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绩效的最优化。

（三）团结和谐塑造国家治理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如同治理机制的“精神纽带”，既为党派合作提供共识基础，又为资源整合注入内在动力。政治认同不仅能够在政党之间促进政治互信，也能进一步在国家治理中规范各政党的职能定位，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关系。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认同根植于百年历程中团结奋斗、荣辱与共的历史记忆，其构成了超越制度文本的情感纽带。从现实的维度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认同体现为共同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发展根本利益的同质性，形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这一目标建构突破了党派间短期利益博弈的局限，将执政党的战略导向、参政党的界别诉求及全体人民的利益期待，整合为具有长期稳定性的价值共识体系，使多元政治主体所代表的差异化政治力量转化为具有共同使命感的治理共同体。与此同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基本方针，在治理实践中逐渐完成从制度要求到政治文化的转化，内化为各政党主体的政治自觉。

三、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挑战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国内社会发展需求与国际社会复杂局势的多重挑战。中国新

型政党制度在制度体系、主体能力和政治生态等层面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影响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一) 制度体系的系统化规范化建设尚未完善

制度优势的体现如果不通过一定的机制载体,实现制度各要素之间的有效配合以发挥制度的整体功能,制度的美好构想就难以落地^[8]。在实践运行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系统协同存在顶层设计的理想形态与地方基层落实适应性不足的张力。新型政党制度架构立足国家整体建构,通常由中共中央出台指导意见,地方再制定实施细则,其目标宏阔且涵盖内容广泛。而地方与基层因缺乏科学规范的指引及健全的监督机制,在落实中易出现“一刀切”现象。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导致利益诉求复杂化,协调各方利益难度加大,“一刀切”的做法难以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诉求,使政策落实大打折扣,不利于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同时,当前民主党派市级以下基层组织在机构设置、经费配置、办公场地等方面存在短板,导致新型政党制度难以在基层全面落地。加之制度执行监督的缺位,使得制度落实出现相机化执行现象,难以严格依照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容规范、程序要求与约束强度逐层落实^[9]。制度实施的规范保障不足削弱了制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进而偏离制度制定的初衷。

(二) 部分制度主体的能力建设不足制约优势发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治理效能,核心依赖执政党与参政党的主体能力建设,其治理能力直接影响到治理效能的发挥。从执政党来看,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认知偏差,在决策部署上表现强势,并未把同各民主党派“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原则贯彻到日常领导工作之中,导致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趋于边缘化和流于形式。从参政党来看,随着民主党派新老交替的政治交接,少部分年轻的民主党派成员对多党合作

的发展历史缺乏情感认知,同时在实践层面缺乏合作共事的历练,其成长路径存在局限性,对制度的科学合理性缺乏理性认知,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甚至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进而影响了其履职的深度和积极性。此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专业供给与治理需求出现错位,当前部分民主党派存在明显能力短板,高端专业人才存在结构性缺口。在人工智能治理、碳中和等新领域的专家型成员人才缺乏,难以回应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复合型治理议题。

(三) 制度运行的政治生态影响制度效能转化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政治制度的效能发挥取决于政治发展的外部环境,就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还面临许多挑战^[10]。首先,国内民众制度的认同感相对薄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民众思想观念与价值观日趋多元,不同的价值观念也产生激烈的碰撞与交流,部分民众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可度和参与性不高,这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权威性形成了严峻挑战。其次,我国的国际政党制度话语权相对弱势。长期以来,西方基于自身历史形成的“两党制”“多党制”话语霸权,将其政党制度包装为“普世模式”,并通过学术理论、媒体传播、国际组织等渠道构建话语壁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话语表达上仍存在理论建设落后于实践的困境,导致制度优势难以被准确认知,被曲解甚至丑化。这种局面会影响国内民众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自信,还可能在全球合作中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互信,制约了新型政党制度转化为治理影响力的进程。

四、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路径

新时代,我们需要在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成果和发展经验进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

效能,更好满足当前国情下的治理需要。

(一) 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体系

制度体系的系统完备,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础。加快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必须强化制度供给,着力加强系统化、规范化建设。第一,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创新。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完善和丰富新型政党制度体系方面成效显著,《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制度、政策的密集出台,深刻体现了“制度治国”的治理理念与战略决心。第二,构建自下而上的制度反馈与调适机制。在国家治理场域中,针对基层协商中的异质性需求,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必然会因地域差异呈现情境化特征,建立自下而上的互动式反馈机制,将基层创新经验及时转化为制度资源,能够推动形成契合地方实际的合作治理方案。第三,构建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程序保障体系。在政治协商维度,需建立议题设置的规范化筛选机制、协商过程的平等互动规则及政策转化的制度化反馈链条,强化协商民主的程序规范性与成果转化率。在参政议政维度,应完善重大决策的前瞻性调研制度,构建提案办理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通过战略咨询与政策评估提升资政效能。在民主监督维度,需以知情权保障为基础,健全监督信息沟通与结果反馈的制度化渠道,为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提供全链条的程序保障。

(二) 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能力

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自身领导能力,加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能力,需要补足治理短板、发挥制度优势,合力将新型政党制度潜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应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通过战略规划与体制创新,将多党合作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1]。要深化理论武装,

提高党的政治引领能力,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纳入干部教育核心课程,系统提升领导干部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认知水平。要完善制度执行机制,制定政治协商工作细则,明确协商议题确定、成果转化、跟踪反馈等全流程规范,将多党合作纳入党政部门绩效考核体系。要提升组织动员能力,在重大战略实施中建立党派联合协同机制,将更多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的力量团结到党的周围。同时,需要提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能力。着力提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与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实现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长期共存,在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有所作为^[12]。

(三)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话语体系,本质是通过系统化的话语生产与传播,回应国内制度认同的深层诉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的现实挑战,为制度效能转化营造良性政治生态。第一,强化制度叙事的话语建构。习近平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1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加强多党合作,创新方式,真实、全面、生动地展现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特点与优势。深入联系多党合作的历史和实践,阐释我国政党制度的治理成效,增强国内民众的制度认同感。第二,创新分层分类的话语传播机制。对于国际政治精英和知名学者,可邀请其参加政党论坛,在中外政党论坛等平台构建平等对话空间,运用比较政治学方法解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通过发布《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等权威文件确立话语基准;对于国外民众,着重宣传中国政党制度在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成效,宣传民主党派界别特色优势,通过社会服务

实践展现制度实效^[14]。第三，深化理论创新与人才支撑体系。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以“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为特征的政党制度分析框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要加强研究人才队伍培养，建立“政学研用”协同机制，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库建设等平台，培育兼具学术洞察力与实践解释力的研究队伍，为话语体系构建提供持续的知识生产能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0.
- [3] 王永香，刘婷婷. 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J]. 社会主义研究，2020（4）：15-22.
- [4] 何建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创造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3）：62-74.
- [5] 冯永昌. 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和途径 [J].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4）：36.

- [6] 魏梓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治理效能转化研究 [D]. 大连理工大学，2021：86.
- [7] 艾明江. 嵌入型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国家治理：基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发展经验 [J]. 理论与改革，2019（5）：38.
- [8] 林尚立. 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29.
- [9] 徐凤月，魏晓文. 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及优化路径 [J]. 长白学刊，2023（1）：50-51.
- [10] 苟立伟. 民主集中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23（4）：56.
- [11] 冯玉丽. 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运行机理与独特效能 [J]. 前沿，2022（4）：18.
- [12] 张献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201-207.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5.
- [14] 蒋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演进历程、重大成就和实践要求 [J]. 甘肃理论学刊，2022（5）：43-45.

责任编辑：蒙晓哲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政引领路径与体系研究

乔彩燕¹ 肖静¹ 熊成帅²

(西北工业大学 1. 党委统战部;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人数较多,在教学科研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做好该群体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具有价值观念多样、社会影响力大、职业压力突出等群体特征。针对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存在的引领内容体系性不足、工作合力有待增强、对象精准性欠缺、载体运用不够有效等问题,应明确思想主题、贯通组织覆盖、强调精准施策,通过专题研修、联谊交友、智慧平台等方式联动创新载体,系统性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 高校 党外知识分子 思想政治引领

中图分类号: D6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4-0017-05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尊重是前提,加强引导是关键,发挥作用是目的”。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是统战部门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

党外知识分子是高校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的重点工作对象,他们既是推动高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智力资源,也是实

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关键群体。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137.3万高校教师中44.7%是党外知识分子,《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高等教育专任教师207.49万人,按相关比例计算,党外教师人数规模可观。高校教师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强化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既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新时代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战略需要。进入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厘清高校党

收稿日期: 2025-09-15

基金项目: 西北工业大学高教研究基金委托项目“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政引领体系研究”(GHIW2026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乔彩燕,女,西北工业大学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研究方向:高校统战;肖静,女,西北工业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研究方向:高校统战、思政;熊成帅,男,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思想史。

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的群体特征、关键问题和实施路径,创新构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

根据高校统战工作实际,对党外知识分子可作广义和狭义上的界定。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指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参加了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和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无党派知识分子;狭义上指的是,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无党派知识分子^[1]。本文取广义概念,即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外知识分子。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相对于党内知识分子,是一个队伍更庞大、成分更复杂、思想更活跃、组织较分散、管理更难的群体^[2]。当前,具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的党外知识分子比例显著提高,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面临新形势与新挑战。

(一) 思维十分活跃,价值观念多样化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社交广泛,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同时具有独立意识和创新意识。在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等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面前,立场特别坚定,头脑特别清醒,爱国热情高^[3]。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与政治视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多种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的冲击^[4],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大多具有海外留学、工作、生活经历,受西方的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思想影响,具有较强的批判意识,呈现出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整体特征。

(二) 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影响力较大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处于教学科研一线,大多具有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升,关心时政热点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关心学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能够发挥政治资源和专业特长双重优势,积极参政议政,多平台多渠道展现个体价值,特别是一些党外代表人士专业能力突出,在所从事研究领域和社会层面都有较大影响力。

(三) 趋向职业焦虑,教学科研任务重

在“双一流”建设的强力推动下,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正处在一个快速变革的动荡期,“非升即走”“非升即转”政策的实施,使高校青年教师面临愈来愈大的压力,并且出现了身份认同的重重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职业焦虑问题^[5]。普遍存在的职业压力现状,要求对青年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引领既要考虑其可投入精力等因素提升工作质效,又要营造人文关怀,加强对青年党外知识分子的精神感召激励,有效改善其职业焦虑状况。

二、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关键问题

新时代以来,高校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持续完善制度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提升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质效,同时也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

(一) 推进思想政治引领内容的体系性不足

党中央要求,要完善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和文化卫生单位的重要阵地作用,坚持政治引领、价值观引领、事业引领,引导党外知识分子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6]。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引领,需要不断深化“三个引领”,不断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在高校工作实践中,有的思想政治引领内容不够系统全面,有的没有结合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特点丰富拓展,有的结合本校优势和思想政治工作特色不够紧密。

(二) 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合力欠缺

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是统战部门的主责主业,但仅依靠统战部门单打独斗无法取得良好效果。有的高校缺乏协同有效的工作机制,相关职能部门资源未能有效整合,有的高校将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与宣传思想工作、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统筹

推进还不够均衡,有的高校基层单位更多关注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对党外知识分子教育引导重视不够,这些都会制约工作合力的形成。

(三) 提升思想政治引领针对性精准性不够

高校统战工作范围主要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少数民族人士、有宗教信仰的人士、港澳同胞及在高校就读的港澳同胞及其亲属(包括在大陆定居的台胞和就读的台湾学生)、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重点是专业领域成果显著、政治上有代表性、社会上有影响的党外人士^[7]。本文所研究的广义概念上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涉及种类繁多,思想状况和思想政治引领重点也存在差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引领工作面向不同群体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精准性的思想政治引领还不够有效,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一招鲜”局限。

(四) 有效运用思想政治引领各类载体乏力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迅猛,获取信息的方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原有的说教式、灌输式等单一的教育方式收效甚微。在此情形下,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急需因时而变、因势而新,有效运用各类新技术新方法新平台开展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但部分高校面向党外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时,还存在人文关怀欠缺、典型示范带动不足,互联网思维不强、信息化本领不高等问题,减弱了思想政治引领的感染力与吸引力^[8]。

三、高校强化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的实施路径

新时代强化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要准确把握其群体特征,真正解决“向哪里引领,靠什么引领,怎么引领”等问题。立足高校统战工作实践,可从内容、机制、对象、方式四个维度,创新构建“主题鲜明、组织覆盖、面向精准、载体多样”的“四位一体”工作体系,系统性强化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

(一) 内容维度明确思想主题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是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方向^[9]。在内容维度上,强化“三个引领”,突出“红”“特”“新”主题,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真正筑牢共识之基。

1. 以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为根本,与党同心铸魂。关键在于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在任何形势变化和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在党的领导下维护好统一战线的稳定大局,自觉成为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推动者、捍卫者和建设者^[10]。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理论清醒坚定政治自觉^[11]。

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高校特色文化助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滋养人心,引导党外知识分子传承家国情怀,带头明德修身、砥砺品行,发挥坚守正道、弘扬正气的表率作用^[12]。高校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学科优势和文化氛围,这些特色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精神内核,也是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资源,将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与学校特色文化相结合,是提升教育实效性、突出学校独特性的关键路径,能够有力推动党外知识分子主动融入学校改革发展大局,在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以国家最新发展战略为牵引,伟大事业激励人心。要聚焦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国家战略,鼓励党外知识分子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服务和积极融入国家最新发展战略,在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上发挥作用、担当表率、实现价值。

(二) 机制维度注重组织覆盖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是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建立统筹协调机制,融入高校大思政工作全局,实现组织覆盖。要坚持“统战工作大家做”的工作理念,在机制维度上,贯通“上”“中”“下”培养,统筹资源、同向发力。

1. “上”要坚持党委高位推动。高校党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作为学校党建工作、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切实发挥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工作体系,完善制度机制,真正做到整体谋划、协同推进。

2. “中”要坚持部门合力推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是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工作和内容,必须树立全校“一盘棋”思想。可在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思想政治专项联席会议机制,形成领导小组议大事、专项工作机制抓日常的工作模式,学校党委统战部加强与学校党委思政工作领导小组各部门的协同联动,做好工作统筹和落实。各相关部门要将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形成推动工作的强大合力。

3. “下”要坚持基层主动推动。一方面,发挥基层学院党委基础性作用。基层单位是党外知识分子日常工作的直接单位,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给帮助、促团结时更有说服力,要将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纳入本单位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发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 and 统战团体作用。通过创新开展跨学院、跨学科学术交流合作等,给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更多人文关怀和发展助力,不断提升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也有助于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 对象维度坚持精准引领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多样性,应按照“更加精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要求,根据不同群体特点分类施策。本文以三类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为例,在对象维度上,聚焦“高”“青”“归”特点,不断增强工作针对性和精准性。

1. 针对党外高层次人才,以参政议政、发挥作用为导向。党外高层次人才普遍具有深厚的专业造诣,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承担国家重要科研项目,在学术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对于党外高层次人才的政治引领,在深入开展政治理

论培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能力、增进政治认同的基础上,要着眼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发挥作用需要,通过开展建言献策能力提升、推动校地企合作等形式,发挥党外高层次人才的社会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及高水平智库作用,引导他们积极建言献策、实现双岗建功。

2. 针对党外青年教师,以强化政治引领、助力成长为导向。党外青年教师大多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同时面临着“非升即走”“非升即转”压力。要改变传统说教式教育,创新开展“统战+”特色品牌活动,注重人文关怀和时间统筹协调,不断增进党外青年教师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四个认同”。要积极搭建平台,围绕高校中心工作创造学习互鉴、交流合作机会,在教学、科研、科技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给予党外青年教师指导和帮助,助力他们快速成长成才。

3. 针对归国留学人员,以留学报国、服务社会为导向。归国留学人员普遍有着深厚的家国之情、爱国之心,但有些人回国后也面临着多种问题。有的是出国时间较长,对中国国情新变化有所生疏,出现“水土不服”;有的是接受组织教育培训的机会较少,把握不好发挥作用的方向;有的是融入工作团队难,导致事业发展不顺^[13]。对于归国留学人员的思想政治引领,要大力弘扬留学报国传统,教育引导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通过组织专题培训、国情社情考察、分享交流等,帮助归国留学人员熟悉国情社情,了解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的强国建设之中。

(四) 方式维度用好各类载体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普遍具有高学历、高专业素养和思想活跃的特点,传统教育模式难以适应其认知特点与发展需求,只有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载体矩阵,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才能在把握党外知识分子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润物无声的引领效果。在方式维度上,可通过“点”“线”“面”联动,实现思想政治引领全覆盖。

1. “点”上突出重点。用好校院两级联谊交友平台,党员领导干部点对点同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深入沟通,从政治上予以引导,从思想上予以沟通,从工作上予以帮助,从生活上予以关心,切实为党外知识分子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人才引进等多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和情感关怀^[14]。此外,借助上级各类平台渠道,推荐重点培养的优秀党外人士参加专题培训、调研、考察等,鼓励他们参与政治历练和实践锻炼,不断提升政治把握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

2. “线”上多措并举。利用红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资源,定期组织各类专题研修班,有计划、有组织、分批次选派党外知识分子参加,以线带面,激发其家国情怀、提高其履职能力。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高校中心工作积极担当作为,选树典型先进,广泛宣传,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3. “面”上创新方式。打造统一战线学习平台品牌,面向学校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定期邀请统战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战线历史等开展全覆盖理论宣讲,在更广范围上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加强智慧统战系统建设,实现网络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有效联动,实现对统战成员的精准教育、精准管理、精心服务和精确评价,适应人工智能发展新形势,基于高校人工智能本地化部署进展,主动谋划积极作为,将

统一战线政治优势和数智赋能有机融合,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

【参考文献】

- [1] 张继辉,李小宁.统一战线中的知识分子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3.
- [2] [4] 张彩云.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56.
- [3] 林旻,王伟芳.关于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导的若干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21(7):79.
- [5] 田贤鹏,姜淑杰.为何而焦虑: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焦虑调查研究:基于“非升即走”政策的背景[J].高教探索,2022(3):39.
- [6]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112.
- [7] 本书编写组.统一战线知识手册[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148.
- [8] 刘静丽,王虎.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研究:以江苏省高校为例[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2):32.
- [9] [11] [12] [13] 本书编写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87,88,88,92-93.
- [10] [14] 赵佳明,赵玲玲,孙晋.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3):29,30.

责任编辑:程凯丽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生成逻辑、 独特优势和经验启示

宋鑫华 周玉琴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从生成逻辑来看，统战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从独特优势来看，统战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经验启示来看，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统一战线自身建设，推进统战工作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5) 04-0022-05

“坚持统一战线”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回顾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发挥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促进不同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的大团结大联合，形成全体中华儿女齐心协力共奋斗的生动

局面。实践充分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接连取得成就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法宝。

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生成逻辑

(一) 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推动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思考和探索无产阶级统一战线问

收稿日期：2025-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2XDJ020）；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网络统战工作机制研究”（2025HZ1111）；中央党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新时代参政党建设研究”（300102165614）；长安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学位论文选题与研究方法运用研究”（300103131104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鑫华，女，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统一战线理论；周玉琴，男，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题,在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统一战线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毕生致力于全人类解放事业,在他们的著作中包含了“联合”“联盟”以及“团结”的重要思想,为无产阶级对内与对外团结统一、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强调了无产阶级团结统一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反对剥削阶级,实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和根本目标,必须既加强本阶级的团结统一,又团结其他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一切可能的力量,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阶级联盟思想,即在革命运动中建立工农联盟以及工农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的联盟。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灵活运用统战策略,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根据社会主要矛盾,采取不同策略联合相对进步的阶级和阶层反对共同敌人,必须牢牢掌握阶级联盟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第二,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联合思想”,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理论。一方面,列宁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思想。在深入调查研究后列宁对农民进行了具体的阶级划分,依据农民中不同阶层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进行引导和教育,突出强调无产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列宁提出了建立“两个统一战线”的思想,即建立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以及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统一战线,丰富了统一战线的内涵。而在反对帝国主义、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列宁则强调,“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2]。他正式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拓宽和发展了统一战线内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理论。

(二) 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实践探索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还相对模糊,提出了要与其他政党“断绝一切联系”的观点。但是很快就在党的二大上初步提出统一战线的方针,党的三大更是进一步明确联合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第一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的标志。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指出要取得革命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共中央陆续召开了六次中央统战会议,把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指出,绝不能丢掉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绝不能削弱这一政治优势,绝不能动摇这一长期方针。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为党领导的,包括广大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在内的广泛联盟。统一战线在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首次以中央名义召开了统战会议,成立了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把党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关于统战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

议,提出了新形势下关于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同心圆论”、关于支持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制度效能论”、关于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新三种人”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吸纳论”等一系列统战工作的新论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把统一战线放到党的工作全局和战略问题上来研究和部署,深化和拓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2022年7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指出,“爱国统一战线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4]。

(三) 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与“和合”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深厚理论养分,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根脉”,其中包含的大一统思想与“和合”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历史文化根基,赋予其鲜明的文化特色。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5]大一统思想滥觞于夏商周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强追求政治一统化发展,孔子周游列国提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儒家以“王者无外”“定于一”的思想表达大一统观念。到秦朝建立统一封建王朝,在国家统一的理念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汉朝董仲舒为维护专制统治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通过秦汉时期的统一国家建构和儒家思想发展,大一统思想也基本形成。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及其思想成为了国家发展的主流,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主流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也与统一战线理念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总之,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通过汲取大一统思想和“和合”文化中蕴含的统一、和谐理念,在其统战思想中厚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创新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独特优势

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智力优势、资源优势。

(一) 凝聚共识,发挥思想引导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征程,“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统一战线在党百余年奋斗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始终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主要任务而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就是凝聚起最广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就是凝聚起所有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就是在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各民族各阶层共同努力,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统战工作就是调动一切有利于民族复兴的积极因素,凝聚所有认同中国梦的爱国人士。

在党百余年奋斗的各个时期,统一战线都紧紧围绕实现民族复兴这一目标而展开工作。

(二) 凝聚人心,发挥协调关系的组织优势

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7]统一战线要解决好不同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的关系,这不仅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而且关乎国家稳定和繁荣。统一战线工作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科学把握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呼应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引导广大成员顺应时代潮流,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做出努力。如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具有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性大的优势,能聚焦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及时反映群众最关切的问题,使集体智慧进入国家政策议程并依据客观情况适时优化决策,真正体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

之事众人商量”的人民民主真谛。爱国统一战线有助于凝聚各方力量。爱国统一战线能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有效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全面激发社会各阶层积极性、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中国力量”。

（三）凝聚智慧，发挥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

在党百余年奋斗的各个时期，统一战线坚持凝聚各方人才和智慧，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局面，统战工作以争取知识分子为重要内容。为此，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并在多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邀请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2000 余名海外中华儿女响应国家号召陆续回国，极大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邀请胡子昂、胡厥文等五位工商界的党外人士，围绕国家经济建设问题展开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广大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积极性投身经济建设第一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内生优势，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魄力广开进贤之路，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获得了智力支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凝聚力量，发挥联系广泛的资源优势

人脉宽广、联系广泛是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中的资源优势，能够为国家治理整合、汇聚力量。统一战线工作对象涵盖十二类群体，社会关系多，延伸范围广，联系群众密切，因而具有联系广泛资源的优势，为国家治理提供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资源。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政协制度，将各民主党派及各类社会群体联系起来，保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亲密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实现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少数民族团结和组织起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通过

中国侨联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组织起来，凝聚海内外同胞的思想共识、家国情怀，助力祖国发展，维护民族大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经验启示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要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加强统一战线自身建设，以统一战线汇聚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

（一）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

统一战线工作的百年发展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统战工作才能始终保持正确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统战工作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等专项会议，对统战工作各方面进行部署安排，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统战理论。

习近平指出，“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8]。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工作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一重要法宝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一方面，要让统战工作主体和对象能够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任务，保证统战工作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都有利于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要明确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主要为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集体要履行主体责任，将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形成全党上下齐动手的局面，保证统一战线工作得以完善和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把握时代任务，明确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核心主题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支撑，对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根据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中心任务的变化，灵活构建适应时代需求的统一战线，汇聚起克服挑战、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磅礴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并发展统一战线，就必须坚守中华民

族大团结大联合这一核心主题。“大”不仅体现在统一战线工作覆盖的广泛范围上,更蕴含着包容与博大的精神;“团结联合”则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即愿与所有投身现代化建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力量携手并肩,不遗余力地汇聚每一份可团结的力量,共促发展。坚持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统一战线持续发展与壮大的不变主题,要求我们长期坚守并不断开拓创新,以促成全球中华儿女心志合一、力量汇聚的宏伟图景。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多元利益交织的挑战,将来自不同阶层、持有不同观念的人们紧密团结起来,关键在于践行大团结大联合的基本方针。

(三) 加强统一战线自身建设,凝聚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人才合力

统战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归根到底需要统战部门和统战人员来开展具体工作。一方面,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第一,加强统战部门的政治建设。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确保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第二,加强统战部门的思想建设。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主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第三,加强统战部门的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增强统战部门的工作能力。第四,加强统战部门的作风建设。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第五,加强统战部门的纪律建设。做好纪检监察工作,开展重大决策部署专项监督、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专项监督等。另一方面,加强统战人员自身建设。形成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统一战线干部队伍,是加强统一战线自身建设的关键。

(四)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百年统战史表明,统一战线有效推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为重点领域。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作用,不断推动这五个领域的现代化,

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推动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现代化。统一战线要发挥服务作用,为民营经济发展搭建良好平台;要发挥载体作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第二,推动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现代化。要发展和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高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的实效;要在法律制定、修改、监督等环节发挥统一战线人士的作用。第三,推动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现代化。通过协商、引导、合作等方式,帮助统一战线成员消除消极思想,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第四,推动基于社会公平的社会现代化。要引导统一战线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帮助党和政府调节社会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工作。第五,推动基于保护自然的生态现代化。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监管体制等方面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共识,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16 (01).
- [2]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69.
-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257.
-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3.
- [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
- [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7-02 (02).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56.
- [8]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01).

责任编辑: 马文婷

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生成逻辑、 价值逻辑与实践逻辑

令小雄 丁佳雪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多元利益博弈的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以及社会流动性的显著增强，亟须创新统一战线理论。当代统一战线理论正经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深层转型：推动统一战线从“夺取政权”的革命逻辑向“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范式跃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推动统一战线从利益整合机制向价值认同体系演进，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政治共同体意识。这种双重维度的理论创新，既是破解新时代统一战线治理难题的关键路径，更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对全球秩序变革的战略选择，标志着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理论的重大突破。

关键词：新时代 统一战线 党的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5) 04-0027-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指针，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1]统一战线理论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发展。进入新时代，必须更加坚定统一战线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推进统一战线理论的革新。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历史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同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实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当前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已经拓展至新的社会阶层、海外侨胞、网络群体等多元主体，传统工作模式亟待升级。如何在多元利益格局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多样思潮碰撞中凝聚共识，成为统战工作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收稿日期：2025-09-15

基金项目：2024年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西北师范大学）“深化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专项课题”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研究”（2024SDSF04）；甘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研究”（2023YB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令小雄，男，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西北师范大学）研究员，研究方向：统一战线理论；丁佳雪，女，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统一战线理论。

一、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生成逻辑

(一) 对马克思统一战线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实现自身解放的进程中,联合其他阶级力量的必要性。马克思深刻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工人阶级不仅要实现自身内部的团结统一,还要与农民阶级建立紧密联盟,因为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工农联盟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一种大合唱”。同时,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无产阶级也应与之联合,但在这个联合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性,绝不能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被其他阶级同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统一战线朝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前进,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关键。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征与俄国革命实际,提出了“两个联盟”^[3]思想。

在马克思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牢牢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对统一战线做出不同的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阶级状况和强大的敌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阶段的革命任务,创造性地建立和发展了不同形式的统一战线: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其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自身局限性,使革命走向胜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基于时代发展的新变化,进一步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4]江泽民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事关全局的长远战略方针,指出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争取人心、

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5]。胡锦涛强调,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6]。这一观点在继承对统一战线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未来使命出发,进一步拓展了统一战线法宝地位的内涵。

(二) 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文化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文化资源,文化本身就是凝心聚力的基础。”^[7]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结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大一统”等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政治理念,早在《春秋公羊传》中就有“大一统”的提法:“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8]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汲取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强调国家政治统一与文化包容并济。以“大一统”文化为精神纽带,强化全体中华儿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共同体意识,推动政治凝聚与文化包容协同发展。《国语》中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9],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深刻诠释了其中和谐共生、求同存异的理念,将其转化为协调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实践方法。在国际层面,“和合”的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文化支撑。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交流交融,进而推动不同国家合作共赢,将“和合”文化思想从国内拓展到国际,使统一战线的文化价值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三) 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确立的现实必要性

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以及肩负的使命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角度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等正在重塑人类社会形态。

从国内角度看,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面对的矛盾问题和风险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艰巨。习近平强调“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10],并对新时代的统一战线理论做出了创新性的阐释,这一理论蕴含着党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系统性回应与前瞻性布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统一战线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肩负着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奋进力量的时代使命。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聚焦“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创新路径。在总结社会实际以及传统文化经验的基础上,理论创新强调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完善港澳台制度体系推进祖国统一,发挥海内外侨胞的纽带作用汇聚全球人才,为中华民族复兴构建力量支撑。

二、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价值逻辑

(一) 政治价值:提升党的全面领导与政治引领力

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要讲究政治性,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进行思想政治引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方面人才有效组织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凝聚起来,形成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11]。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整合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多元群体,构建起政治认同、利益共享、目标同向的有机整体。新时代统一战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源于对党的百年统战实践的系统总结,体现了对统战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统战工作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

(二) 社会价值:促进社会和谐与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我国统一战线体系框架也更加稳定与成熟。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包括政党关系中的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关系中的民族区域制度、宗教关系中的宗教政策制度、阶层关系中的亲清政商关系制度以及海内外同胞关系中的“一国两制”制度等在内的制度体系,直接关系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12]这集中体现为固守圆心、扩大共识,要求我们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汇聚社会各方力量,通过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平台,构建起广泛的社会协同框架体系。

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领域,统一战线理论始终秉持团结与强化国家认同的价值导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通过增进不同民族、宗教群体间的理解与信任,化解潜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全体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推动社会公平方面,统一战线理论聚焦不同群体的权益保障,着重关注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各方资源进而保障各个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平等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构建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三) 文化价值:推动文化交流交融

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强化民族精神纽带等方面,更体现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文化根基、凝聚精神力量。在多元文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统一战线理论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推动文化交流交融层面,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打破文化藩篱,搭建起多元文化交流对话的桥梁。一方面,通过整合以往统战资源,促进国内不同地域群体之间的文化交

流互动,推动各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另一方面,以中华文化为精神纽带,积极搭建起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吸收借鉴优秀外来文化成果,实现不同文化的互学互鉴、共同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文化动力。

在弘扬中华文化过程中,统一战线理论将构建文化认同作为核心任务。依据统战工作的广泛覆盖面和强大凝聚力,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时代价值,通过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丰富文化实践载体,将文化认同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全方位、多层次地引导社会各界深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使中华文化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表达,将抽象的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具体的文化符号与实践活动,以“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3]为意象,让各民族群众在共同参与中增进情感共鸣、深化团结意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成为推动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 国际价值: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突破着重解决国内问题的局限,以全球性视野和开放格局深度融入国际事务,在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展现出独特而重要的国际价值,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思想指引。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14]统一战线在这个国际背景下的重要意义突显,在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统一战线理论的跨文化交流功能也得以充分彰显。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平台,统一战线积极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增进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以及发展理念的理解与认同,化解文化隔

阂,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开展跨文化合作提供了成功范例,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发展格局。

三、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实践逻辑

(一) 强化统一战线政治功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强调,“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15],深刻揭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谋求‘最大公约数’旨在最大程度地找到利益结合点和共同价值观,‘同心圆’和‘公约数’的核心是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6]强化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需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三个方面共同发力。制度上,要加强和完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统一战线工作全过程。通过制度建设明确各统战部门的职责分工,构建起党中央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组织上,要加强统战部门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思想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统一战线成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只有不断强化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才能“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17],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二) 巩固以人民为中心的大团结大联合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18]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巩固以人民为中心的大团结大联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人

民主体思想的实践延伸,也是应对复杂形势、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9]一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巩固大团结大联合的根本原则。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始终将人民置于中心位置,把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有效回应多元利益诉求是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现实路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战略性工程。共同利益是构建统一战线的基石,更是维系不同群体合作的关键纽带。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20]大团结大联合是贯穿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与核心价值导向。

(三) 深化新时代大统战格局,凝聚强大合力

深化大统战格局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向实践转化的关键路径,而队伍建设则是构建这一格局的重要支撑。在当今社会背景下,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队伍建设与“分众统战”的实践体系构建,能够有效提升统一战线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理论创新的顺利落地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与人力支持。

其一,人才队伍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核心资源,直接决定着理论创新向实践转化的深度与广度。我们要与优秀的党外人士交朋友,“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善于联谊交友,特别是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21],与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党外知识分子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扩大统战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要着重加强统战干部队伍的政治建设、能力建设与作风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高素质统战干部队伍。

其二,构建“分众统战”的实施体系。分众统战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发展的关键方

向,要求我们立足个体需求与群体特征打造差异化的工作体系。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包括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多元群体,其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与社会角色存在着显著差异。分众统战不仅能够有效回应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更能将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融入,激发统战对象的主体意识与参与热情,实现统一战线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模式转变,最终形成多元协同、共建共享的新时代统战工作新格局。

(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发展统一战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国际背景下,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从国内治理向全球治理的延伸,既是理论自身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体现,也是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正确判断形式是谋划未来、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22]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坚持整体与部分共同发展的思维,全面系统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精准识别全球治理中的发展困境,制定出既契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诉求,又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需要的科学决策体系。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发展统一战线,把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设想转化为可操作的全球治理实践。通过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凝聚价值共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视野,凸显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

(五) 构建数字统战范式,提升统战效能

习近平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23],这一论断为统战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下,技术赋能已成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的关键路径。构建数字统战模式,需从数字技术深度应用与构建网络统战话语体系两个维度协同发力,通过创新工作模式、创新话语表达,全面提升统一战线工作效能。“互联网+统战工作,是顺应网络公共政治时代对统战工作创

新要求提出来的。通过影响力较大的网络人士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隐患,唱响互联网大团结大联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舆论主旋律。”^[24]

一方面,从战略层面统筹规划,制定科学长远发展方案并完善配套制度,保障这一系统工程能够有序推进。同时也要培育专业化数字管理人才队伍,为新时代统战数字化发展筑牢根基。此外需要依托智能化数据平台突破传统统战工作模式的时空局限,大幅拓展统战工作覆盖范围。另一方面,网络统战要聚焦“最大范围争取民心,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顺应当今网络空间作为意识形态主阵地的现实,以互联网思维创新工作范式。通过优化网络话语表达方式主动回应多元利益诉求,以平等理性的对话方式增进价值认同,将网络打造为凝聚人心的强磁场。推动网络民意采集与线下政策实施强效对接,将虚拟的共识转化为现实治理效能,形成线上线下互动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借助网络传播优势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的统战理论,扩大统一战线影响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汇聚磅礴力量,推动统一战线事业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08.
- [2] [2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9,573.
- [3]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6.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3.
- [5]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9.
- [6]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0,556.
- [7] 李艳霞. 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统战工作的双向赋能[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7):103-111.
- [8] 春秋公羊传[M]. 黄铭,曾亦,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6:2.
- [9] 左丘明. 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47.
- [10]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J]. 求是,2024(2).
- [11] 习近平.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J]. 求是,2020(15):6.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57.
- [1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73.
-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857.
- [1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5-6.
- [16] 臧秀玲,贾晓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多维阐释[J]. 科学社会主义,2024(1):48-56.
- [17] 习近平. 论教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144.
- [1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
-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4-305.
- [22] 习近平.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J]. 求是,2023(1):4-14.
- [2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98.
- [24] 沈桂萍. 促进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两个大局”视野下的统一战线新话语[J]. 贵州民族研究,2023(6):51-57.

责任编辑:张嘉瑶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实践要求与路径探析

刘小蒙

(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 基层是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终端”，是团结联系统战成员的重要领域，基层统战工作是党的统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作基石。进入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范围与对象持续扩大、内容与要求日趋复杂。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基层统战工作全面推进、提质增效，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可以从统一共识、提高站位、夯实基础、坚持创新、明确职责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基层统战工作提高增效策略。

关键词: 新时代 统一战线工作 基层

中图分类号: D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4-0033-05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对于党的统战事业而言，基层是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终端”，基层统战工作是团结联系统战成员的重要领域，也是党的统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作基石。

一、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重点与特点

(一)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重点任务

基层统战工作主要是指县（市、区）和企事业单位的统战工作，包括乡镇、街道、机关、学校、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医疗卫生等单位的统战工作^[1]。其中，乡镇（街道）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是团结联系服务统战成员的前沿阵地，也是党的基层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乡镇（街道）统战工作是深化基层党的建设、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事关延伸统战工作覆盖面、实现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宏伟目标，对推进新时代基层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革，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统战成员日益向基层延伸，统战领域不断向基层拓展，乡镇（街道）统战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工作主要任务和重点不断丰富和突出。具体而言，乡镇（街道）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落实统战方针政策、做好团结引导服务、发现培养党外人才、帮助服务统战成员等四项重点内容。其工作重点更加聚焦于维护民族宗教和谐稳定、促进非公经济“两个健康”、提升侨务工作水平、支持统战工作创新实践等四个方面。

收稿日期: 2025-09-15

作者简介: 刘小蒙, 女, 中共常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 讲师, 研究方向: 党的建设基本问题。

（二）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发展态势及特点

1. 基层统战工作的范围与对象持续扩大。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统一战线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作范围持续拓展，工作重心不断向基层延伸。进入新时代，基层统一战线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工作领域从传统的政治领域向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社会等多个维度拓展，^[2]形成了多领域交叉融合的工作格局，工作内涵更加丰富多元；另一方面，工作对象更加多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断涌现，新兴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持续增加。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基层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其教育引导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党外知识分子队伍规模持续扩大，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和回国投资或定居的海外同胞越来越多；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不断加快、基层信教群众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2. 基层统战工作的内容与要求日趋复杂。新时期中央提出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由原始的“双重任务”^①升级为“四个服务”^②，这意味着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方式也由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向发挥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大局等方面转变。具体表现为，一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更加重大。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呈现新特征，不同阶层、利益群体间的摩擦日益复杂化，民族关系面临新情况，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3]基层统战工作亟须发挥“减压阀”作用，既要能够妥善协调复杂社会关系，又要能够及时化解突出矛盾，更要把新兴社会力量有效凝聚起来。二是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当前统战对象呈现职业类型多、地域分布广、文化层次差异大等特点，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

元。这就要求基层统战部门必须创新思想政治引领方式，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将合理诉求纳入法治轨道；激发统战对象参与热情，使其成为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三是服务民生改善的使命更加迫切。面对人民的期盼，基层统战工作必须紧扣民生关切，聚焦教育、医疗、就业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搭建利益表达和协调平台，推动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这既是践行统战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举措。^[4]

3. 基层统战工作的方式与手段发生变化。在数字化转型和全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基层统战工作方式正经历着全方位的创新升级。一是传播方式实现全媒体转型。不少基层统战部门开始探索突破传统宣传模式，逐步构建起“传统媒体+新媒体”的立体传播体系，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传播形式，将统战政策理论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实现从“单向传播”向“互动传播”转变。二是工作模式转向数字化互动。改变过去单向调研方式，建立起“线上倾听+线下服务”的双向互动机制。有的基层统战部门尝试通过开发统战专属APP、建立网络社群、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民意收集从“抽样调查”到“全景把握”的升级。三是教育方式突出实践化导向。突破传统课堂教育局限，创新“理论教育+实践锻炼”的培养模式。不少基层统战部门通过创设“统战实践基地”、组织“统战成员基层行”等活动，推动统战成员在服务社会中深化认识，使得基层统战工作切实深入到群众中。

二、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困境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各地均高度重视基层统战工作，进一步落实责任、完善机制、破解难点，基层统战工作任务更加明确、制度更加规范、作用更加突出，大统战格局不断巩固完善，基层统一战线凝聚力和贡献力不断增

强。但在提质增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基层统战工作仍面临一些短板困境，必须精准施策、有效破解。

（一）基层统战工作意识有待增强

基层统战工作虽然日益受到重视，但在实际推进中仍面临重视程度不足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一是工作推进存在“温差效应”。在基层统战工作的部署中偶有出现上级部门高度重视、中层单位被动应付、基层执行流于形式的问题。二是思想认识及能力水平存在“双重局限”。部分领导及工作人员对基层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深刻、对“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解不到位、甚至存在“重经济轻统战”的片面政绩观。实际工作中存在政策理论功底不足、工作艺术掌握不足、群众工作本领不足等“三不足”问题。三是社会认知存在“知晓度困境”。由于部分群众、统战对象不了解统战工作内涵、不理解统战政策要义、不认同统战工作价值，使得一些基层统战工作覆盖难延伸，成效难持续。

（二）基层统战工作投入有待提升

基层统战工作投入不足是基层统战工作存在的最普遍，最直接的问题。一是编制少。多数基层仅1—2名专职统战干部，普遍存在“单枪匹马”和“孤军作战”的状况。特别是部分乡镇（街道）的统战委员和统战干事，身兼多职，不仅负责统战工作，还得经常性的负责处理乡镇（街道）内征地拆迁、计生、工程招投标、民政中心工作，工作任务重，内容多，往往是“耕好了别人的田，却荒了自己的地”。二是队伍老。不少单位把即将退休人员都往统战部安排，部分基层统战部门领导干部年龄偏大，工作开展思路、能力受限。三是经费缺。部分乡镇（街道）尚未建立常态化的统战经费保障机制，既未在年度财政预算中设立固定统战工作科目，也缺乏必要的调研考察、教育培训等专项经费支持，导致基层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面临“无米下炊”的困境，甚至日常业务开支都不得不挪用其他项目资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不仅影响了其他工作的正常开展，更严重制约了统战工作的质量和成效。

（三）基层统战工作方法有待创新

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足。部分干部对统战理论政策的学习仅满足于文件传达和书本知识，未能深刻把握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新内涵、新特点，导致在工作中出现理论认知与实践应用脱节、政策要求与基层实际脱节、工作部署与落实效果脱节等问题。二是基层统战工作的载体陈旧。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部分基层统战工作载体创新明显滞后于数字化发展进程，一些基层统战部门仍沿用“纸笔记录+人工跑腿”的陈旧工作方式，智能化应用水平较其他党务工作较落后，制约了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覆盖面、吸引力和实效性。三是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比如，基层统战干部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完善，易导致基层统战工作干部队伍存在“本领恐慌”，制约基层统战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提升；考核奖惩机制的不完善，易导致部分统战工作人员出现“避责思维”“躺平现象”和“应付心态”等不良心理，工作积极性低；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既浪费时间又影响效率；选拔任用体制的不完善，往往使得一些年轻干部刚摸出点统战工作的门路，做不到几年就要调离，新来的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又得重复这条老路。

三、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提质增效的路径探索

（一）统一一个共识：统战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协同配合

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共同来做。各级党委、统战部门自上而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着重从政治上考量和推进统战工作。首先，始终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把基层统战工作纳入基层党建总体布局，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党组织的主体作用，依托区域党建共

建,加强工作力量的整合,使乡镇(街道)各级党组织成为落实统战方针政策、凝聚统战成员的坚实阵地。其次,按照系统化思维、社会化方向、网络化手段、项目化推进、平台化管理和品牌化发展等工作理念,不断建立完善基层党委统一领导,乡镇(街道)党委书记亲自抓,专职统战干部具体抓,各部门分工协作,各方积极参与负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营造共同来做统战工作的良好氛围。再次,建立健全常态化培养机制,通过专题培训、实践锻炼、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切实提升基层统战干部的政治站位和业务能力,不断增强做好统战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着力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基层统战工作队伍。最后,打造“线上+线下”宣传矩阵,提高群众对基层统战工作的了解度、信任度和认可度。线上,可运用短视频、H5等新媒体技术制作“统战知识微课堂”。线下,可在村、社区、产业园区等设立统战文化宣传角、开展“群众身边的统战故事”征集活动、举办“同心文化节”等,通过文艺展演、成果展览、用群众语言讲统战故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基层统战工作可知可感。

(二) 围绕一条主线:统战工作必须提高站位,服务中心

统战工作是党的政治工作。各级党委、统战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把服务中心大局作为开展基层统战工作的出发点,明确统战工作服务中心大局的着力点和结合点,引导广大统战对象立足自身优势,发挥好“智囊团”“人才库”的作用,当好深化改革“助推器”,在服务地方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维护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宗教事务条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抓好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确保民族宗教界和睦和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其次,促进非公经济“两个健康”。有针对性地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与商会组织的工作

联系制度、定期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反映企业诉求,帮助其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指导属地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5]。最后,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加强对侨界群众的思想引领,积极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推动“党建带侨建”,健全完善基层侨联组织载体建设,引导侨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和参政议政工作。

(三) 把握一个重点:统战工作必须夯实基础,配齐力量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各地党委要从加强基层统战工作基础建设入手,选配工作人员、配备办公设施、完善工作制度、健全工作档案、摸清工作底数,将统战工作经费列入财政固定预算支出,确保基层统战工作有人管事、有人干事、有地方办事。首先,在配备上下功夫,确保队伍的稳定性。各乡镇(街道)要进一步落实配备1名统战委员、1名统战干事和1名专职民宗助理的安排,落实村(社区)联络员制度。要确保统战委员主要工作精力聚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商会组织建设、民族宗教工作等,切实回归主责主业。对人员配备不到位、统战委员履职不到位的及时整改纠正。在特色小镇、园区(功能区)、重点楼宇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统战工作联络员。其次,在培训上花时间,增强队伍的实干性。认真开展统战理论政策宣传教育,将统战工作纳入乡镇(街道)党组织年度宣传培训工作计划。乡镇(街道)要拓展统战宣传载体,定期开展统战专题宣传活动和面向统战成员的学习教育培训活动;乡镇(街道)统战干部任职期间至少参加1次上级统战部门组织的轮训;要将统战工作纳入乡镇(街道)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每年至少开展1次统战专题学习活动,增强基层党政干部的统战意识,力争当好统战成员的贴心人。最后,在管理上动脑筋,增强队伍的精良性。一方面,积极探索完善统战系统干部轮岗交流锻炼工作机制,在重点工作一线、改革攻坚一线、矛盾调处一线、服务群众一线等岗位锤炼干部;另一方面,健全和完善干部考核

办法,坚持把工作实绩和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使用、培养和奖惩的重要依据。此外,乡镇(街道)党委、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为统战阵地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每个乡镇(街道)至少设立1处统战阵地,对统战阵地建设和辖区内统战团体组织开展统战活动给予经费支持。

(四)着眼一盘大棋:统战工作必须坚持创新,提升质效

基层统战工作的活力来自创新。要鼓励乡镇(街道)发扬首创精神,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和改进基层统战工作的理念、路径和方式方法,充分运用“统战+互联网”的工作思路,搭建党委政府与统战成员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和桥梁,画出最大同心圆。首先,统一建设大数据平台。乡镇(街道)党组织要全面了解掌握辖区内统战工作情况,定期排摸统情,根据辖区统战成员分布特点,及时建立维护更新各类统战成员基础信息库,将本地统战成员和重点人物、在外乡贤的基础数据纳入信息库,实施在线动态管理。继续建立针对本地统战工作的需求清单、资源清单、服务清单和特色项目清单,实现基层统战组织管理和统战对象联系服务的信息化。其次,探索“统战+平台”工作模式,打造统战各领域各条线组织、联谊、教育、服务平台载体。如创新构建校地统战联盟、党派之家、新阶层创业之家、商务楼宇委员会和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服务等统战工作平台,推动基层统战工作向特色小镇、产业园区、楼宇商圈等城市两新组织集聚区域延伸覆盖。最后,进一步按照“有机制、有队伍、有阵地、有品牌”的标准,加强统战阵地建设。坚持应建尽建的原则,在集聚区党群服务中心、特色小镇、产业园区等建立统战阵地或统战组织。同时,结合实际开展乡镇(街道)统战工作品牌项目建设,将本地区统战资源进行系统化整合,形成特色亮点,在每个辖区选1至2个市级乡镇(街道)统战工作典型,及时总结经验,积极宣传推广,推动乡镇(街道)统战工作在创新中提升、在提升中创新,推进基

层统战工作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落实一个责任:统战工作必须职责明确,严保落实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要求,切实履行统战工作职责,主要负责人为统战工作第一责任人。首先,将统战工作列入日常议事日程,统一谋划,加强对辖区范围内统战成员开展活动的指导和协调;其次,定期对统战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督促检查,建议乡镇(街道)党委每年专题研究统战工作不少于2次,重要工作随时听取汇报,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分析解决问题,总结推广经验,为基层统战工作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再次,结合实际制订年度统战工作方案,形成具体工作清单,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最后,将乡镇(街道)统战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党建考核内容,保证分值权重,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设置具有针对性、导向性的考核指标,确保统战工作任务量化到位、责任落实到位、作用发挥到位。

注释:

- ①“双重任务”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的双重任务。
- ②“四个服务”即为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服务,为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服务。

【参考文献】

- [1] 李玉娥. 对加强新形势下临沧基层统战工作的思考[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3): 40-41.
- [2] 傅端贵. 新形势下制约基层统战工作开展的原因分析和应对之策[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6): 47.
- [3] [4] 吕力: 关于加强基层统战工作的研究[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2): 10-11.
- [5] 谢伟. 做好基层统战工作的“三个一”[N]. 学习时报, 2019-04-12(05).

责任编辑: 黄晓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 载体运用效果及当代启示

张静月 官玉涛

(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74)

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纪律教育作为促进党内团结统一的重要环节。中共中央以党校教育、文艺作品、报刊媒介为载体加强党的纪律教育；通过干部学校加强党员纪律理论教育，采取话剧、戏剧等文艺形式宣传党的纪律，提升纪律教育的生动性和吸引力；通过党报党刊进一步扩大纪律教育传播范围，逐步推动纪律教育的规范化，增强纪律教育的生动性和传播力。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加强纪律教育的载体形式及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 纪律教育 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5) 04-0038-06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一个高度重视纪律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将纪律建设作为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之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显著优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加强纪律教育，以党校教育、文艺作品、报刊媒介为载体，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些探索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的载体

延安时期，随着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和党内

成分的复杂化，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逐渐显现。为了加强新生党员的纪律性和整顿军队纪律，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党校教育、文艺作品和报刊媒介广泛进行纪律教育，使党员深入理解和遵守党的纪律，从而确保党内团结统一。

(一) 以党校教育为载体进行纪律教育

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高等干部学校、推进党校纪律教育，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增强其遵纪守法意识，严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

收稿日期：2025-09-15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团队项目“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路径研究”(2024XSYL10)；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阐释专项“新时代加强党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领导的优势与路径研究”(2024CSZX23)；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研究生教育教学中世界视野的培育研究”(GRSCP202431)；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载体及当代价值”(SZKY2024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静月，女，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官玉涛，男，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多所高等干部学校。为整顿党的作风、提高军队战斗力,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1]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干部学校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纪律教育,主要通过理论教育培训的方式,将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等经典著作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教育内容,要求广大党员熟知纪律对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为了确保党组织纪律严明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内很多中高级领导干部纷纷走上干部学校的讲台,亲自进行纪律教育。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到马列学院就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问题向学员们作了精彩演讲,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要有“遵守纪律的修养”,讲述列宁关于纪律的重要观点“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2],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陈云授课时指出,“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3]。领导干部走上讲台,以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为内容,推进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了党的纪律要求,激发了党员干部自觉遵守纪律的坚定性。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干部学校加强纪律教育,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纪律性,为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以文艺作品为载体进行纪律教育

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大爱国青年奔赴延安。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汇聚了众多艺术人才,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艺工作者。为贯彻执行党的纪律,党中央自上而下通过各种文艺载体如话剧、戏剧、美术、诗歌宣传党的纪律,使纪律教育深入人心。为了度过

抗日最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们进行了大生产自救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军民一起劳作生产体现了在党的纪律面前,军民一律平等。歌曲《生产大合唱》《南泥湾》、秧歌剧《军民大生产》、古元创作《南泥湾驻军秋收图》(又称《八路军生产运动——打场》)、力群的木刻版画《帮助群众修理纺车》等一系列文艺作品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军民的团结合作、鱼水情深,中国共产党纪律性强的画面。起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制作成宣传画报在街头张贴,制成条幅悬挂在大街小巷,后谱成曲在军队中传唱开来,通过简单多样的文艺形式,使党的纪律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党员干部了解和遵守党的纪律。

1944年阿英创作了历史话剧《李闯王》。剧中李自成在起义初期特别强调“官兵平等”,严守军队纪律,对贪污腐败行为严惩不贷,对于当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军队纪律教育有着启示意义。延安时期还出现许多街头诗,如“八路军真正好,既会打仗又耐劳,不打百姓不扰民,大家快快来效仿”,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的成效。此外,简平创作的木刻版画《满水缸运动》、艾灸创作的《借东西要还》、林平的《群众关系》、沃渣的《八路军帮助人民麦收》、雏雅的《八路军帮助抗属扬场》、张望的《帮助蒙古族人民秋收》等,均极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教育的成效^[4]。延安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将纪律教育理念与艺术作品相结合,使文艺成为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的有力武器。

(三) 以报刊媒介为载体进行纪律教育

党报党刊和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纪律教育的主阵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多样党报党刊,如《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等。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顺利开播。党报党刊和广播电台的双重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的宣传效果。其中,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需要,于1941年创办的大型日报《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

共中央的机关报，其在推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宣传纪律教育中起到重大载体作用。如针对七大党章提出的党的纪律是全党统一意志和行动的根本保证，《解放日报》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报道，及时跟进党的纪律教育方针政策，掀起党员干部学习党章、遵守纪律的热潮，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

在纪律教育宣传上，党报党刊注重运用正反面典型起到正面激励与反面约束作用。正面典型方面，党报党刊积极宣传遵守纪律、服务群众的党员干部。如1946年，《边区群众报》发表《绥德县大批区干部，作风转变，光荣获奖》，重点介绍绥德县党员干部工作作风转变的先进事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向他们学习。在反面警示方面，党报党刊公开披露违反纪律的党员干部案例。如1937年，针对黄克功一案，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5]该案经报道与广播，引起党内外强烈反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品格。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报党刊、广播电台为载体加强了党的纪律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第一时间获得中共中央关于纪律教育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载体的运用效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载体推动纪律教育的发展，通过党校教育、文艺作品、报刊媒介等载体形式，有效地提高了纪律教育的规范化、生动性和宣传力，增强了纪律教育的覆盖面和传播力。

（一）推动纪律教育的规范化

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主要利用行军间隙开展纪律教育。延安时期，党的纪律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突击转向正规，由零散转向统一，通过固定的校址进行理论培训，以此加强纪律教育。为深入动员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开展学习竞赛活动，

并决定设立干部教育部。1939年2月，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并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系统规划了干部教育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标志着全党进入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轨道。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明确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6]，着重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干部头脑。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和要求，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律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推动纪律教育高效进行。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是延安最有影响力的大学。中国共产党在抗大开展有序的纪律教育，使干部学校的纪律教育越来越规范。毛泽东给抗大确立的教育方针是“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并定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7]的校训。加强纪律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保证革命胜利，毛泽东指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8]干部学校提倡党员干部的“悟原著、学文件”的重要方式，加强纪律意识，强调其“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时刻提醒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有无违反党的纪律，着重在思想上强化纪律意识，提高理论水平。总之，从早期战场上开展纪律教育到在干部学校中推进系统学习，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党校教育为中心的纪律教育体系，使党的纪律教育更加正规和完善。

（二）提升纪律教育的生动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陕北风俗民情，创造性地运用歌曲、戏剧、木刻版画、街头诗、宣传标语等喜闻乐见的文艺载体形式，极大地提升了党的纪律教育的生动性。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鉴于当时大多数党员干部出身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纪律理论被党员干部理解、接受和掌握并非易事。而形式的文艺作品，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阐释党的纪律

教育内容,宣传党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有效辅助了党的政治宣传工作。1942年由鲁艺五人团创作的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生动展现了边区群众的民主生活,同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的形象。此外,一些美术作品如黄铸夫创作的《紧握着我们的手》、刘铁华创作的《军民合作才能打胜仗》,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传达了党的纪律教育和军民团结的重要性,极具生命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1943年林平创作的连环版画《群众关系》,描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新一旅一团战士吴彦生在敌区工作时,借了老乡一口锅烧水喝,一不小心把老乡的锅打破了,于是拿出一块钱赔给老乡,但是老乡拒不接受,吴彦生就跑到别的地方买了一口锅给老乡。其真正做到了“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贯彻了党的群众纪律^[10]。秧歌剧《军爱民,民拥军》生动再现了军民和睦的画面:年关将至,村民王二与其妻为八路军战士准备了肥羊白布,而八路军王班长严守党的纪律,将减轻群众负担的政策贯彻到底,拒不接受。该剧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致、鱼水情深”的画面。总的来说,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从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真实生活中选取素材,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和反面案例反映到文艺作品中,生动形象且高效地宣传党的纪律教育政策,作品具有鲜明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使党的纪律深入党员心中。

(三) 增强纪律教育的宣传力

在延安时期党的纪律教育宣传中,党报党刊发挥了重要作用,显著增强了纪律教育的传播力。在谈到党报和通讯社作用和地位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党报和通讯社是一切工作的武器。为促进党的纪律的有效传播,扩大党员干部接受范围,《解放日报》增设了工农兵通讯员,确保党的纪律教育指示迅速而准确地传达到基层,对于反腐倡廉、严明纪律起到重要作用。为广泛动员党员干部群众,报社还通过识字小组、读报小组、广播宣讲等方式,将纪律教育渗透到党员干部群众中,提高干部群众对纪律教育的参与度。

《解放日报》还通过评论文章的形式公开揭露党员干部违反纪律现象,如《从肖玉璧之死说起》《肃清党员的发财思想》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遵守纪律;开设专栏,发表如《大问题》《客多于主》《“就文件讨论文件”》等文章,痛斥基层干部工作作风问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遵守工作纪律,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首要职责。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廉洁纪律教育,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为进一步纠正党内不良作风,《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严肃革命秩序,遵行政府法令》,强调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严格遵守边区政府的法令。中共中央还充分利用广播电台的功能,要求各地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广播,了解党的纪律教育方针、指示以及进展情况。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及党报党刊全方位宣传了党的纪律教育思想,通过表彰遵守纪律的模范干部和揭露违反纪律的反面典型,对党员干部起到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党的纪律教育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载体运用的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党校教育、文艺作品、报刊媒介载体,使党的纪律教育取得显著的成效。新时代,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应吸收借鉴延安时期纪律教育载体运用的经验,继承和创新党的纪律教育载体形式,提高党的纪律教育效果。

(一) 创新运用纪律教育管理载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校教育为载体加强纪律教育,使纪律教育逐渐规范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教育要完善纪律教育体系,成立纪律教育管理工作专组,加强对纪律教育的管理。

第一,完善纪律教育管理体系。各级党委应严格遵循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条例》《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2024—2028年）》等党内法规，系统地优化党的纪律教育管理体系。一方面，各级教育管理机构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纪律教育重点要求和基本原则，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尤其是政治纪律教育。各级党委要承担起党的纪律教育主体责任，将党的纪律教育培训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中。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党的纪律教育培训考核制度。加强对师资队伍考核，重点考核政治方向、政治纪律、理论政策水平、师德师风等内容。对于参训干部的考核，则应重点关注其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提升，以及政治理论掌握和党性修养锤炼情况，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成立纪律教育管理工作专组。纪律教育工作专组必须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等党规要求，加强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党员干部应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行动准则，牢记党规党纪，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断增强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意识。在教育方法上，纪律教育工作专组要注重反面案例教学，以案明纪，增强纪律教育的说服力，从违反党的纪律案件中，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案例进行纪律教育分析。在具体案例分析中，贯穿党的理想信念教育、主题思想教育、廉洁文化教育等内容，使党员干部时刻保持对党忠诚，维护党的权威，敬畏法律、严以律己。同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干部自我剖析有无违反纪律行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心中时刻警醒，不触碰违纪红线。

（二）创新运用纪律教育文化载体

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党员干部加强纪律教育具有深远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纪律教育文化载体，并大力推进纪律教育文化建设，使纪律教育与文化载体深度融合。

第一，不断探索纪律教育文化载体。以漫画

说纪、口袋书助学、纪律教育文创产品等丰富党的纪律教育文化载体。漫画说纪具有艺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富有亲和力与感染力的特点。各地纪委监委可将近年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作为素材，进行漫画创作，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例如，云南省红河州纪委监委和弥勒市纪委监委共同创作的警示教育系列漫画，将公务用车、公款旅行、违规吃喝那些违背党的纪律行为用漫画展示出来，教育党员干部树立正确价值观，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为夯实党员干部纪律理论基础，各地纪委监委推出“口袋书”助学，将中共中央关于纪律教育的重要文件和指示编入“口袋书”中，并选取近年来违法违纪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刻剖析编入口袋书中，让党员干部时刻保持警醒。纪律教育“口袋书”方便党员干部随身携带、随时翻阅、随时对照，使其履责“随身有册子，心中有尺子”，增强纪律意识。

第二，深入推进纪律教育文化建设。推出反映纪律文化的优秀文艺演出，充分利用好社区，打造纪律教育文化画廊，使党员干部深入其中，廉洁自律。各地纪委监委高度重视将纪律教育与文艺作品相结合，如广东省惠州市开展廉洁文艺演出活动，《政法之歌》歌颂法治的正义与公平，《莲舞清风》给观众带来纯洁与清雅的莲花舞，《清廉好家风》鼓励党员干部继承好家风。再如福建省创办的“文艺倡廉”作品展演，包括闽剧《贬官记》、交响合唱组歌《中国精神》、交响咏诵会《为政以德》、高甲戏《李光地》等廉政题材精品剧目在北京各个高等学校和梅兰芳大剧院等上演，获得一致好评，该演出突出理想信念、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勤政为民的纪律教育思想，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引领社会风向，教化育人。深入推进纪律教育文化建设，能使党员干部接受纪律文化熏陶和教育，保持廉洁自律，进一步增强党性意识和廉洁意识。

（三）创新运用纪律教育传媒载体

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必须不断丰富和创新纪律教育载体形式，充分利用“微信”“抖音”

等现代传媒载体,扩大纪律教育的传播范围,进一步增强纪律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第一,注重开发纪律教育“微”载体。中央纪委监委可通过“清廉中国”“纪法小课”“一周纪录”等系列微视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微视频,以及反腐倡廉主题微电影、动漫作品,使党的纪律教育深入人心。这些“微”载体不仅创作成本低,而且效果显著,成为地方纪委监委宣传党的纪律的有效载体。同时,中央和地方纪委监委应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传播系列警示教育短视频,以更加便捷、快速的方式将党的纪律教育内容传递给广大党员干部群众。2021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被评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百个成绩突出账号”,充分体现了其在党的纪律教育宣传中的积极作用。中央纪委监委致力于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融合,构建集“一网一端一微”于一体的平台,充分发挥其思想引领、警示教育的作用,将党的纪律教育贯彻到底。

第二,推出专题纪律教育网络视频。为深化党的纪律教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积极推出专题纪律教育网络视频,通过警示教育纪录片的形式,展现中国共产党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和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制作一系列专题纪录片如《忏悔录》《巡视利剑》《正风反腐就在身边》《零容忍》《永远吹冲锋号》等。这些纪录片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通过选取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深刻剖析违纪违法行为的根源以及演变过程,真实展现涉案人员思想悔过过程,警示领导干部增强纪律意识,筑牢思想防线,发挥了警示作用强、传播范

围广、问题剖析深刻的功能^[11]。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推出《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专题纪录片,再次彰显中国共产党正风肃纪反腐的坚定决心。通过拍摄和播放警示教育纪录片,可为党的纪律教育营造积极良好的舆论氛围,显著增强党的纪律教育成效。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28.
- [2] 列宁. 列宁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00.
- [3] 陈云. 陈云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5.
- [4] [10] 郝雪廷. 八路军抗战文艺作品整理与研究(木刻版画卷)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206-211, 209.
- [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9.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7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中共党史资料: 第7辑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3: 36.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8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45.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9.
- [11] 陈国辉. 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百年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 (17): 46-48+77.

责任编辑: 刘悦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的三维阐释

刘宇超¹ 徐 渊²

(1. 西安财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65; 2. 共青团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身、指导自身的使命型政党。党的历史使命引领党以科学理论结合自身实践,形成符合中国特色、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调查研究思想。从认识论、目的论和方法论三重维度来审视党的调查研究理论基因与实践进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内在规定,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身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回应,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调查研究 认识论 目的论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2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4-0044-06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把调查研究视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先手棋”“金钥匙”“基本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围绕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就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路、新举措,为新时代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1]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视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党围绕各个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既从认识上弄明白为什么要进行调查研究,也从方法上搞清楚如何开展调查研究;既看到调查研究对党和人

民事业的推动作用,也认识到调查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复杂问题。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我们党才能不断积累新经验、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

一、认识论意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中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方法原则与经验总结。毛泽东曾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2]周恩来要求:“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3]邓小平指出:“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4]习近平强调“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

收稿日期: 2025-09-15

作者简介: 刘宇超,男,西安财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党史理论;徐渊,女,共青团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法学学士,研究方向:党史理论。

路线的重要内容”^[5]，要了解实际，就必须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坚持客观实际，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眼光思考问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调查研究认识论意蕴的高度概括与集中体现。

（一）坚持客观实际的基本观点

客观实际是认识论的基础，为认识活动提供物质条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思维观念能够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言：“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6]这种“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通过实践推动认识从感性上升至理性，从现象深入本质，实现主客体在观念上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承认外部世界的物质性。列宁指出：“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7]这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遵循物质运动的规律。

从认识运动的反映论来看，认识的辩证运动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过程。列宁概括道：“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8]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客观存在的辩证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9]。无论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抑或是“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都离不开调查和研究。辩证的认识运动既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的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10]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概念形成的过程、判断推理的过程、思维转化的过程和反复实践的过程。“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绘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1]

（二）坚持普遍联系的基本观点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在认识论层面既要探索世界本质“是什么”，也应积极解决周遭“怎么样”，两者渐进且不可分割，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的联系是无限永恒的。正因如此，事物间才能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在社会调研中，必须遵循唯物辩证观点，摒弃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会使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导致党的指导路线出现偏差。邓小平指出，我们党“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12]。离开调查研究，抛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原则，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坚持唯物辩证法，必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整体谋划，既把握大势，又注重细节。既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又要进行前瞻性设计。“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13]，要把握好全局与局部的系统性和耦合性，切实关注调查研究对象的关联性与可行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在于其哲学的真理力量。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有从普遍联系的角度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查研究才能按照正确的方向稳步推进。

（三）坚持变化发展的基本观点

唯物辩证法既科学解释了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的普遍联系原理，也进一步揭示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其本质规定上是发展变化的。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事物、现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同事物、现象的运动、变化、发展不可分割、互为表里。恩格斯概括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4]，“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15]。变化，乃天地之自然。究其调查研究的对象甚至活动本身，在本

质上,规律表现为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灭亡的过程。列宁认为:“必须更确切地理解进化,把它看作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互相转化。”^[16]这种“产生”“消灭”和“互相转化”,指向客观事物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的高质态,即从低级向高级、从无序向有序,从简单向复杂的多样性、多向性与现实的总体方向性转化。

坚持以变化发展的观点指导调查研究工作,就是要用客观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观趋势。若调查研究对现实的观照停留在同一经纬,要么犯经验主义错误,要么犯教条主义错误。作为我们党调查研究思想的开创者,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解决党内教条主义的“金钥匙”。他认为:“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17]唯一正确的办法,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18]。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发展的眼光聚焦矛盾问题,才能有效推动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9]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要义与规律特征,进而不断夯实调查研究的认识论基础,持续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

二、目的论意蕴:聚焦具有时代特征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问题的产生为调查研究的具体展开指明了方向。“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20]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调查研究优良传统,力戒形式主义、知行不一,调查研究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工作方法。

(一) 考察党的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沿革,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作为重要实践形式,调查研究旨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主体通过实践检验自身主观目的、愿望和计划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从而验证认识的正确性。

为了全面了解中国贫苦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经常利用闲暇时间考察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1]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毛泽东实地调查农民运动后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2]正是基于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革命实践,共产党人才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世界上只有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瞎说一气,不需要依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而坚持唯物辩证法,则要求用大气力、下真功夫。”^[23]形而上学会使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毛泽东告诫党员干部,思想和革命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24],“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25]。“调查问题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6]只有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真实材料,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规律。如果我们“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27]。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赴多地实地调研,根据各地经济材料撰写了《论十大关系》,标志着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

为了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8]。“我们开会,作报告,

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29]“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30]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入调研,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围绕社会矛盾与发展目标,强调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前提。他指出:“这个结合的过程,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的,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31]胡锦涛坚持发扬党的调研传统,聚焦发展主题,通过扎实调研系统回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最终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二) 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不懈纠正形式主义

党的作风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人心向背。习近平强调:“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32]作风直接关系执政效能与党的形象。只有有效甄别不良作风的多样表现,才能精准治理。当前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集中体现于三方面:主题模糊、实现姿态走样、过程浮浅。

一是调研选题模糊不清。能否紧扣党的中心任务与工作实际,是检验调研是否落到实处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存在只有主选题而无真问题,仅凭办公室内拍脑袋、敲键盘作决策的现象。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单个问题背后常是多领域、多层次的矛盾集合。调查研究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既聚焦国家发展中心任务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实现重点突破;又注重整体推进,精准把握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明确工作目标与优先级。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厘清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矛盾。老问题过多易导致主题混乱,调研需有的放矢,避免盲目铺开。

二是调研姿态走形变味。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调研姿态变样,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视基层调研为负担,以“钦差式”“特种兵式”调研应付工作。此类现象劳民伤财、贻误发展不说,更割裂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做好调查研究必须要把目光投向人民群众,“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精神”。“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33]同时,并不是所有的调查研究都能真正了解实情,有些党员干部下基层“就是为了出出镜、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34]。这不仅达不到调研预期,更会衍生成官不为、为官乱为的不良风气,严重影响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阻碍党和人民的宏大事业。

三是调研过程浅尝辄止。深入群众、求真务实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加强领导干部求真务实的作风建设,有助于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习近平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领导干部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善于了解真实情况,努力把握工作的主动权。”^[35]掌握调查研究主动权,要求领导干部发扬求真精神,坚持深入难题集中、群众关切的一线,身体力行开展扎实调研,以恒心和韧劲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和满足人民需求。党员干部需秉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实事求是解决现实问题。

三、方法论意蕴:坚持系统观念,推动调查研究走深走实

科学的调查研究需立足系统思维,注重整体谋划与重点突破,准确把握全局趋势与具体问题的辩证关系。要始终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问题定位,避免片面局限,确保决策契合国家发展与人民利益。

(一) 坚持系统观念,正确统筹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首先,树立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识大体、顾大局。例如,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有

的地方因为局部利益驱动,存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而国家利益要求围绕中心大局,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在维护全局利益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坚决避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指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36]要注意全局性谋划是总抓手,是调查研究中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前提。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这要求在明确重点改革任务的基础上,从全局和局部两方面双向发力,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的系统性和耦合性,加强改革的关联性、可行性,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

(二) 坚持系统观念,审慎把握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做好调查研究,要审慎把握当前与长远的辩证关系。当前是前提基础,长远是远景蓝图,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实践中。新征程上,我们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解决问题的难度显著增加,要“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发挥调查研究在攻克发展难题,推动事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性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习近平强调:“谋划和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全局观念,强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分轻重缓急,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调研任何具体问题,都应自觉摒弃狭隘思维,把眼光放长远,将其置于国家发展和改革总局中去谋划,要思考其在整体改革大局中的定位。要从改革发展全局出发开展调查、研究并解决问题,统筹兼顾、立体推进,充分激发调查研究各要素效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37]这要求我们既要目光长远,洞察大势、精准研判、

把握方向,又要立足当下开展调查研究,扎实推进具体问题解决,以量变促进质变。

(三) 坚持系统观念,妥善处理主要和次要矛盾的关系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就是讲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阐释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辩证关系。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并坚持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把握社会发展阶段的“金钥匙”,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习近平强调:“面对复杂形势、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38]在调查研究中,要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结合,辩证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重点论旨在从众多矛盾中抓重点、抓核心、抓关键,突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到抓大放小,而不是主次不分。当今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各种矛盾交织叠加,辨识和解决矛盾的难度前所未有。因此,要密切关注矛盾的新变化、新特点,用发展而不是静止的观点对待矛盾,准确辨识新形势下的各种矛盾,从全局上厘清矛盾的复杂关系,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不放松,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

(四) 坚持系统观念,充分协调好特殊和一般的关系

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39]。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演进的一般性规律,又立足本国国情和客观实际,展现出中国特色的特殊风采。要坚持系统观念,在调查研究中协调好特殊和一般的辩证关系。既要重视具体情况,注重实践、科学与创新,又要总揽全局,整体推进,确保实现既定目标、维护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一致性。要防止在把握特殊和一般关系上出现片面化、绝

对化倾向,协调好两者的内在统一。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处理好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实现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结语

调查研究是党开展工作的“杀手锏”、科学决策的“晴雨表”、解决问题的“金钥匙”、改进作风的“试金石”。历史和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全党上下重视调查研究,各项决策部署就能符合客观实际,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持续推进;若不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背离党的群众路线,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就会遭遇挫折。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正以更务实、更自信、更开放的姿态大兴调查研究。要持续推进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 [1] [19]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6,81.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01.
- [3]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6.
- [4] [12] [29] [3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7,114—115,113,123.
- [5] 习近平. 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
- [6] [11] [14]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153,492,492.
- [7]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79.

- [8] [16] 列宁. 列宁全集:第5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9,215.
- [9] [13] [18] [21] [24] [25] [26] [3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297,175,92,3,109,110,111,175.
- [10] 列宁. 列宁全集: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8.
- [17] 毛泽东.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82.
- [20] 中央办公厅. 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84.
- [23]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30.
- [2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9.
- [2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 [31]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4.
- [3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87.
- [33] 毛泽东.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4.
- [3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73.
- [35]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523.
- [37]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
- [38] [3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123.

责任编辑:龚 苏

“治理有效”目标下非正式制度 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探析

卞辉¹ 张亚茹²

(1. 西北大学 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2.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行政学院] 校刊部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实现“治理有效”目标，不能忽视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现代乡村治理中，非正式制度蕴含独特的治理理论逻辑：持续效能的制度演进逻辑、制度互补的治理增效逻辑和现代转型的创新适应逻辑。由于乡土文化的传承断裂、制度层面张力不足、实施适用协同不力，在“治理有效”目标下，非正式制度乡村治理效能提升面临现实障碍。提升非正式制度乡村治理效能，应重视传统文化基因的延续，增强非正式制度的现代韧性，并构建以法律为底线的平衡机制。

关键词：“治理有效” 非正式制度 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 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5) 04-0050-06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能提升既是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质上就是要实现“治理有效”。乡村治

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面临情形复杂、问题多样，要实现“治理有效”，必须立足乡村现实，结合乡村特点，探索多样化、多举措的综合治理方案。“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利用乡村资源，除了运用国家法律等正式制度，还应充分发挥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村规民约、道德规范等非正式制度资源在乡村治理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一、“治理有效”目标下非正式制度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

“治理有效”不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和总要求，也是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核心目标。

收稿日期：2025-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项目“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正式制度效能提升研究”（22BZZ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卞辉，女，西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乡村治理；张亚茹，女，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校刊部副编审，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治理有效”通过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以乡村善治为目标,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繁荣发展,从而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治理有效”的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文化重塑,发挥有效的外部行政引导,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习近平强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乡村治理中,发挥德治作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发挥村民内驱力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治理有效”实效化的必由之路,这其中,非正式制度具有独特价值。

非正式制度是与正式制度相对的一个概念,其表现形式多样,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民间观念、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产生、无意识形成的,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特点。不同的文化会催生出不同形式和内容的非正式制度,我国 5000 多年的文明,不同地域、民族形成不同的文化,这正是非正式制度产生的根源^[1]。内生于乡土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以其文化嵌入性体现出本土资源的张力,在乡村治理中平衡着传统与现代、内生与外源的关系,蕴含着独有的理论逻辑。

1. 制度演进逻辑:效能持续。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地发挥作用,缘于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持续性演变调适。非正式制度的产生源于社会生活的需求,其形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内蕴一定社会群体的文化基因,在群体成员的互动交流中深刻影响着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并主要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进行传承。随着社会发展,非正式制度在不断调适中予以延续,保持其核心价值的相对稳定,通过村民对其文化和观念的认同持续发挥作用。新时代,非正式制度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并将其融入现代乡村治理中。

2. 治理增效逻辑:制度互补。在乡村治理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同发挥作用,构建起作用互补的制度体系,呈现出多维度的协调统

一。一方面,正式制度为非正式制度划定边界,保障其合法性,防止其可能产生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为正式制度提供文化土壤和传统根基,增强其适应性。在治理分工上,正式制度通过法律法规实现刚性规范,而非正式制度则依托村规民约、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予以柔性约束,两者在各自的场域发挥所长,增强治理效果;在治理方式上,正式制度确立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保证治理的统一性,非正式制度则因地方适应性更具灵活性,两种规范体系的配合增强了村民对治理措施的认同度;在治理手段上,正式制度是外在要求,从外部实现他律,非正式制度是内在追求,激发村民内生动力,从内部实现自律,两者共同发挥作用,更好达成治理目标。乡村治理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补,源于乡土社会独特的人文环境,在相对的熟人社会中,通过制度协同,增强社会治理效能,实现“1+1>2”的效果。

3. 创新适应逻辑:现代转型。社会的不断发展对非正式制度提出适应性要求,在乡村治理中,非正式制度遵循着“文化调适—功能拓展—形式创新”的适应性逻辑,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通过对传统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回应新时代乡村治理需求。从文化调适来看,非正式制度通过价值重构实现与现代文明的对接。例如,作为乡村自治重要力量的新乡贤,既秉持传统乡贤文化,保留了尊贤尚德的文化内核,有传统乡贤的乡土情怀与道德情操,又担当新的使命并履行职责,有现代社会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新乡贤的作用不容小觑,他们参与村级事务治理,更有利于维护乡村秩序,推动村庄发展。从传统乡贤到新乡贤,体现的是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传承、发展与适应。从功能拓展来看,乡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突破传统的行为规范、秩序维护功能,延伸至公共服务、文化传承、发展引领等领域,更侧重其凝聚、组织、激励、服务等效能的发挥。例如,宗族文化是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发挥乡村古建筑中蕴含的传统宗族文化的治理作用,浙江、福建等地将

宗祠、古厝等转型为复合型公共服务空间，打造文化礼堂，有的还将其打造为便民服务、居民议事地，带动乡村旅游等经济产业的发展。其依托宗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以传统村落建筑参与现代乡村公共服务，拓展传统文化的功能，提升文化影响力，增强文化可及性。从形式创新来看，非正式制度与时俱进，通过组织形态创新、数字化改造等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独辟蹊径，实现治理效能提升。例如，有些乡村的乡贤理事会升级为产业发展的智库，以乡情、经验、技术创新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再如，数字乡村建设有机融合数字技术与传统治理，使非正式制度登上数字化平台，通过微信群、云平台将其转化为可存储、可追溯的有形规则，使其具有更广阔的传播和作用空间，便于外出就读、务工村民的了解、熟识，助力他们积极参与家乡事务，实现非正式制度的现代转型。

二、“治理有效”目标下非正式制度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现实障碍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需要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双重作用，但由于非正式制度的“软法”特质，这类传统治理资源参与现代乡村治理面临较多制约因素，发挥治理效用存在一定现实障碍。

1. 乡土文化的传承断裂。现代化的推进，导致传统文化传承面临冲击，影响非正式制度作用于乡村治理。首先，城镇化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刻改变了乡村传统社会结构，非正式制度失去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末，我国乡村人口为4647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222万人；相较2015年末的59024万人，十年时间减少了12546万人^[2]。大量乡村青壮年外流，很多村庄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乡土文化的代际传承受阻，宗族长老、乡贤等传统权威失去根基，宗族议事、乡贤调解等机制缺失主要参与者。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建的乡村熟人社会逐步发生变化，权威、人情、

“面子”等非正式制度资源治理效能下降。其次，多元文化挤压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消解了村民对非正式制度的文化认同。有些传统习俗在现代化发展中不关注不被承袭，面临消失风险；有些传统价值观念受极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等的冲击，内蕴的仁、义、礼、智、信思想不再为每个人接受；城市文明的发展使农耕文明显得“土”味十足，现代感不足，有些乡规民约不被知晓、族规家训不受重视。最后，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变使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消失。从乡村到城市，居住环境的变化使有些传统文化丧失了承载它的空间场域和文化景观；现代生活方式削弱了传统风俗习惯的仪式感，人们在忽视这些仪式的同时，也解构了其文化内涵；工业化发展使传统手工艺失去发展空间，物质载体的消失并非简单的器物消亡，而是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性改变，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之发展式微。传统文化中的文明印记随着文化的消亡而逐渐消亡，而这正是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内核，也是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核心与灵魂。

2. 制度层面的规制不足。非正式制度本身的“软法”特性使其在乡村治理中暴露出弱点。首先，非正式制度可预期性差。非正式制度适用弹性较大，规则标准不明晰，同一类纠纷在不同情况下处理结果可能差异较大。这种不确定性使非正式制度的结果可预期性减弱，村民难以预测其行为的后果，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符。其次，非正式制度约束力弱。非正式制度解纷主要依靠道德自律、舆论压力等非强制手段保障实施，由于非正式制度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缺少执行保障机制，一旦当事人反悔不愿意履行则无能为力。再次，非正式制度发展滞后。非正式制度作为历史积淀的产物，其发展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易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发生“节奏”失衡。有些滞后的思想和观念会严重影响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效能，与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脱节。最后，非正式制度合法性欠缺。以村规民约为例，有的村规民约没有依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①和民政部等七部门颁布的《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②规定程序加以制定或修订,导致程序违法;有的村规民约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出现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等违法内容^③。再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宗祠规范管理”,实践中,出现利用宗祠文化之名实行权力越界之实现象,干预基层民主实践,挑战法治权威,侵害村民合法权益。

3. 适用中的协同不力。非正式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村民自觉以及基层自治组织的推动,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非正式制度适用有时会因协同不力出现功能断裂问题,影响其治理效能的发挥。首先,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协同不力。在乡村治理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运行逻辑不同,前者强调传统和稳定,运行基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情”“礼”“理”,后者则强调公平正义,基于法理运行,当情理与法理发生冲突时,由此产生的处理结果偏差有时会让村民无所适从。例如,民间习俗中的彩礼、丧葬习俗等已成为村民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当其与法律规定相冲突时易使村民无所适从,不理解自己的“正常”行为为什么被定性为“违法”行为,这即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因二者适用的协同不畅产生纠纷而诉诸法院,案件审判是否应当考虑当地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是“依法办事”还是“依俗解决”,如何实现案件审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也是法官们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其次,非正式制度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不力。在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宗族组织、乡贤群体、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等主体因角色地位、治理方式、治理资源不同,其发挥的作用也各异,非正式制度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力。实践中,各主体因利益诉求不同,其参与基层治理会引发不同问题。基层政府倾向依赖行政手段,追求显性实绩,形式化、“数字”化问题严重;宗族组织、乡贤群体主要以宗族群体利益为

首要考虑;以村委会为核心组织形式的村民自治组织虽然代表村民利益,但是存在民主意识不强、工作不规范等问题;村民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根本,有时无视法律规定和集体利益。各主体协同不力使得非正式制度治理效果不佳,从而导致出现“基层政府‘难为’、新乡贤‘乱为’以及普通村民‘无为’”^[3]的情况。

三、“治理有效”目标下非正式制度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发挥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治理合力。提升非正式制度的乡村治理效能需重视传统文化基因的延续,增强非正式制度的现代韧性,并构建以法律为底线的运行机制。

1. 重视传统文化基因的延续。非正式制度效能提升要立足乡村现实,坚持以人为本,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将传统智慧与现代乡村治理理念相结合,实现最佳治理效果。

(1) 文化传承要“以人为本”。传统文化基因的延续需要人的传承,普通村民、乡村精英、入乡居住创业人员、乡村工作人员都是乡土文化的守护者,乡风文明的涵养者,非正式制度发挥治理效能的推动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与城市相比,乡村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相对有限,要想让乡村留住人,就要实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平衡城乡发展,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发展适宜产业,打造文明乡风,提高乡村生活质量,让乡村秩序稳定安宁,村民生活富足美好,将乡村建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乡村有了“前途”和活力,村民尤其是年轻人才愿意留下来,外面的人也才愿意走进来。具体来讲,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乡村教育、医疗、交通、网络等领域支持政策,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发展农业深加工、旅游、电商等特色产业,鼓励新乡贤带动发展,使村民在家乡过上现代生活,增强本土认同。同时,通过政策推动加强农村各类人才队伍

建设,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各项计划和项目培育乡村人才,鼓励和引导城市人才服务乡村。因而,乡村治理人是关键,解决了人的问题,文化才能传下去,传统文化基因也才有延续的可能。

(2) 多举措保护优秀传统文化。非正式制度是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的行为规则和活动规范,其中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智慧,保护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非正式制度乡村治理效能的前提和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治理智慧,体现为修身立世的和合遵循、崇礼互让的秩序维系、德法并施的治国方略。”^[4]发挥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就要通过建立系统保护机制保护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是要“留住”。设立专项基金予以支持保护,通过博物馆、档案馆留存实物载体,建立保护名录和数据库。二是要“传播”。将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教育;鼓励社区、街道、旅游景点组织开展传统节庆、民俗活动;利用短视频演绎传统文化、文化 IP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三是要“融合”。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在家庭生活的细微处通过言传身教发挥其潜移默化作用,在饮食起居、服饰审美、人际相处中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生活,使其成风化俗。

2. 增强非正式制度的现代韧性。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价值,现代社会治理中,非正式制度治理功效不佳,本质在于传统治理模式与现代社会变迁速度不匹配。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要简单地抛弃传统,而是要构建非正式制度运行新生态,创造非正式制度与现代文明的转化接口,使非正式制度在保持文化传统的同时获得持续更新的生命力。为此,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创新非正式制度,赋予其时代内涵,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从而提升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效能,实现有效治理。

(1) 依托非正式制度建设乡村文明。依托非正式制度建设乡村文明,需激活传统规范的当代价值。例如,在制定村规民约时,融入传统文化中的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等治理内核,纳入生态保护、垃圾分类等现代要求;挖掘家风家训中的治理智慧,树立现代文明理念,提升道德素养;合理利用传统宗族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2) 以多元共治激活非正式制度治理的内生动力。“以重塑共同体意识为价值导向,寻求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与最大公共利益,是新时代文化治理的重要面向。”^[5]推进乡村治理,要挖掘基层政府、自治组织、新乡贤、普通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动能,以在多元共治中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治理优势。要充分利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各自的优势,“形成一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6],以实现“外生秩序与内生秩序的耦合”^[7]。

(3) 数字赋能非正式制度现代治理效能。通过现代技术重构非正式制度的运行方式,可实现其乡村治理效能升维。例如,运用数字技术留存村规民约、家谱祖训,建立“云端”非正式制度档案,无论村民身处何处,都可以数字方式留存文化记忆、强化文化认同;开发网上村民议事厅,通过小程序实现线上议事、红白事申报等村民事务处理;通过线上积分管理系统运行积分激励机制,生成电子红黑榜,引导村民守规不逾矩。

3. 构建以法律为底线的运行机制。法律作为刚性底线,可以有效规制非正式制度在运行中可能引发的违法情形,遏制风俗侵权、规约违法、宗族垄断等情况的发生。以法律作为后盾,既可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治理优势,也能防范非正式制度随意性带来的潜在风险,通过制度创新将“矛盾点”转化为“创新点”,实现两者在乡村治理中的有机统一。

(1) 以法律为依据规范非正式制度。现代社会,法治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推动下,法治思想不断引领着乡村非正式制度向

“法治化”方向发展”^[8]。一是以法律为非正式制度的纠偏依据，避免因违法带来不良后果。如为保证村规民约合法，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员参与其制定，把好合法关。再如，基层政府对辖区村规民约开展“法律体检”，由司法局组织，邀请专业人士对村规民约进行合法性研讨，避免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体现专业性和合法性。二是在法律框架内为非正式制度留下运作和创新的空间。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生态伦理道德、解决基层矛盾纠纷、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传统形式承载现代内核，使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形成规则互补，共同规范村民行为，保障村民权益，实现两者的协同共治。

(2) 实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融合发展。“互补”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理想互动形式^[9]，二者都是乡村治理资源，可发挥两者在乡村治理中的互补作用，甚至可挖掘两者的共性价值，将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非正式制度转化为正式制度，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创造性融合。一是实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对接。例如，针对基层矛盾纠纷，通过构建多元解纷机制实现非诉讼与诉讼制度的对接；在家事纠纷解决中，认可非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适度将民间传统做法对接于司法适用中。二是实现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化。对符合公序良俗的非正式制度，可在立法时予以吸纳。例如，2024年2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涉彩礼纠纷诉讼主体的确定就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民间传统习俗。再如，一些地方流传已久的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民间生态习惯法，体现出传统生态伦理价值，可将其转化为一定范围的地方正式制度。

结语

现代乡村治理中，内生于乡土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是乡民内心认同的行为准则，依然具有独特的治理效能。“治理有效”目标下的非正式制度

效能提升需进一步构建作用机制，既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激活非正式制度的现代适应性，通过构建“正式制度划底线，非正式制度润细节”的协同机制，实现非正式制度治理现代化，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有效治理动能。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一款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②2018年12月，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全国妇联七部门发布《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具体规定了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的制定或修订的具体程序，包括征集民意、拟定草案、提请审核、审议表决、备案公布等步骤。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卞辉. 现代乡规民约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86.
- [2] 国家数据·年度数据·人口 [EB/OL]. 国家统计局，[2025-03-20].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 [3] 高原.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的演进：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 [J]. 东南学术，2023（3）：153.
- [4] 盖逸馨. 打牢社会治理的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N]. 光明日报，2025-06-27（11）.
- [5] 刘亚玲.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治理的基础、逻辑进路与终极关怀 [J]. 中州学刊，2025（6）：82.
- [6] 杨柯. 新乡贤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类型学研究：基于治理嵌入和协商能力的分析维度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6）：61.
- [7] 彭珊，唐少奔. 乡村秩序视角下农村风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 [J]. 贵州社会科学，2024（11）：143.
- [8] 王崇.“互塑”理论视阈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64.
- [9] 邓大才，王墨竹.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 [J]. 理论探讨，2023（1）：39.

责任编辑：唐倩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赵丽维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文化与科技教研部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明确了文化改革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举措,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领航指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效能源泉,为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坚实保障。

关键词: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中国实践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4-0056-0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增强文化自信,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这为新征程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中华文明新形态、完成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2]。

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实践

1978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伴随着经济领域改革,为了克服现有文化体制机制中的弊端,使其适应政治、经

济、社会、科技发展,调整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文化生产关系,重新定位文化的发展格局,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也被逐步提上重要议程。

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探讨了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强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我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3]。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在这份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既提到了文化体制改革,又强调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同时出现的文化体制改革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坚持对外开放条件下强调文化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 2025-09-15

作者简介: 赵丽维,女,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文化与科技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管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使“两个文明”协同发展、携手并进,形成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理想信念和行为道德规范。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围绕文化体制改革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既包括物质层面的需求,也包括精神层面的需求。2020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中国特色,其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化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显著特征,要求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昭示着当代中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着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全新文明形态,体现之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同步推进。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主要任务。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视角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基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高质量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要充分发挥文化所特有的凝心聚力作用,实现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统一,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活力。

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作用关系

(一)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首先,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社会主义

先进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最进步的文明形态。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密不可分。“两个文明”建设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相连。中华文明绵延千年,始终一脉相承,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若没有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就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更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将精神文明建设放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期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在推进发展中,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加强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衔接和配合。而传统的文化体制和管理机制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打破束缚,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以满足“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次,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4],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把握现代化建设新需求,掌握文明发展新规律,深入改革文化体制机制。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能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活力,推动文艺创作的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5]。通过改革打破束缚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既能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又能释放文化产业的潜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发展,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所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仅是推动精神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物质文明的重要手段,最终达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最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精神富有与物质

富足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二者齐头并进，缺一不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一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增长点，经济的发展继而为文化的繁荣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支持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文化，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助力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有助于打破束缚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和强大的动力。

（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效能源泉

第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根源的人民性。人民群众是文化改革与发展的主体力量，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和享有者，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植根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之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和“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都必须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使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协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必须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6]，充分发挥人民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为“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第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道路的方向性。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成为“两个文明”建设坚强的领导核心。制定社会主义文化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任务和路径，确保“两大文明”建设同步推进。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要注重科学性和民主性，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确保各项改革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要加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宣传和解读工作，提高改革知晓率和执行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有害信息的传播。同时，强化文化政策引领，不断完善文化方面相关政策和法规，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动力的持续性。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多样性提出了更高需求。这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相促进，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应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赋能作用，降低文化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教育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展文化传播渠道和方式，提高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效果，增加文化数字产品和实体产品市场比重，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形成可持续闭环。

第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方式的创新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一脉相承的赓续性和推陈出新的创新性。创新是引领协调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

文化内容、形式、业态等方面的创新，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应注重科技应用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提升文化服务的便捷性和高效性，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继续加强文化理论创新，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道路指引。注重地方改革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鼓励各地根据自身文化发展实际，创新工作方法和路径，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模式。推动高新技术在文化产业、遗产保护等领域的应用，挖掘传统文化精髓，结合现代元素，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在文脉赓续和创新创造中，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第五，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步调的一致性。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发挥文化在“两个文明”“齐步走”中的重要作用，为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提供桥梁。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注重两者发展的协调和平衡。以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同时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需求，可以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谁主谁次，谁先谁后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发达与落后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空间同步发展问题，确保“两个文明”发展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协调一致。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展示中华文化精神内涵，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不仅可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而且可以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结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效能源泉。以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创新发展方式，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促进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促进精神富有与物质富足的协同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 [1] 李书磊.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N]. 人民日报, 2024-08-07 (06).
- [2] 吴瑾菁, 付妍妍.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立场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1): 23-32.
- [3] 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历程回顾 [N]. 中国文化报, 2009-11-13 (03).
- [4] 段炼, 张浩.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三重向度 [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24 (4): 14-24.
- [5] 寇清杰, 肖影慧.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五重逻辑 [J]. 理论学刊, 2022 (4): 15-24.
- [6] 张紫旂, 王艺.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3): 45-51.

责任编辑：宋帅华

推动宝鸡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多维思考

——基于文化生态、产业融合与科技赋能等视角

韩 颖

(中共宝鸡市陈仓区委党校 陕西 宝鸡 721300)

摘 要：文化遗产是民族文明传承的宝贵财富，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宝鸡作为西部地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遗存丰富、文物古迹众多，文化遗产底蕴深厚。当前，宝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虽取得一定实践成效，但也存在保护利用规划、前瞻性保护、保护利用创新、品牌建设和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的短板。为此，应从规划先行、挖掘价值、整合资源、科技赋能、壮大人才队伍和加大法治保障六个方面着力，切实加强宝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助力宝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 价值效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5) 04-0060-05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七个聚焦”战略目标，指明了今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其中一个重大战略任务就是“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明资源^[2]。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按存在形态可分为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可移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促进作用。

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价值效用分析

文化遗产承载详国家民族独特的历史记忆，是民族文化中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文化遗产体现独

特的景观特征、资源价值和生态功能，在新发展阶段下，对其进行保护、利用和开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一) 人文传承价值：文化遗产记录和见证人类文明发展

中华民族拥有 5000 多年辉煌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滋养民族生生不息。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是对中华文明的记录和传承。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距今 7100 年至 5600 年之间的墓葬 500 余座、房屋遗址 50 余处、生产生活用具 6000 余件^[3]，为炎帝的生存时代提供更加准确的范围，保存了新石器时期人们在祭祀、耕种、采桑、狩猎、制陶、丧葬等方面的生活面貌。北首岭遗址比西安半坡遗址早 400 多年，史前考古价值十分突出。其船形网纹壶、鸟衔鱼纹壶和陶

收稿日期：2025-01-15

作者简介：韩颖，女，中共宝鸡市陈仓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文化产业与政策。

塑人面像等文物是史前文化艺术的精品。在宝鸡常羊山古神农城遗址上的炎帝陵内,“华夏始祖”四个大字以及殿中精美的壁画,讲述着炎帝带领族人开垦农田、种植五谷,改造民居、织麻为衣、制造武器等传奇故事。宝鸡炎帝祠生动再现了华夏始祖炎帝率先民创制农具、教民农耕、采药祛病、为民尝百草、制琴普乐的情景。文化遗产是先祖生活发展的见证,承载丰富历史,更是探究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

(二) 文化认同价值: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认同

各国独特的文化遗产是其身份和价值认同的载体。地处关中平原西端的宝鸡,曾是西周的发祥地和京畿重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是其标志性文化符号,其中西周早期的“饗簋纹铜尊”(何尊)意义尤为特殊。尊内底铸有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大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4],此处“中国”是指当时天下的中心,王朝的中央。这一珍贵文物,不仅被印于1982年我国发行的第一套文物特种纪念邮票,2002年更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5]。2024年,七年级上册历史(人教版)新教材还以其为封面。“中国”二字既深深印刻在每位中华儿女心中,更有力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宝鸡考察时指出,要加强青铜器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宣传阐释^[6],更好激发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文明的热爱。

(三) 创新元素价值:文化遗产是文学创新的源头活水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软实力也是强国硬道理。神话是文学的源头,是文学产生的母胎。2025年新年伊始,《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视界最成功的动画作品,并成功走出国门。导演饺子认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需依靠作品本身质量,剧本、故事和角色是打动全世界观众的关键。《哪吒2》珍藏不少文物元素,如饗簋纹、龙吞刀、宋徽宗的瑞鹤图等,背后是一部生动的文化百科全书。电影不仅

保留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经典形象和故事框架,同时更重视现代审美和心理特点,赋予了神话故事新的生命力。文化的魅力源于传承与创新的交融。要为沉睡的文化遗产注入创新元素,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四) 养生文化价值:文化遗产为发展康养产业提供支撑

文化遗产蕴含养生文化价值。岐山县岐伯养生文化源于上古医学家岐伯的理论与实践,历经数千年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地方文化标识,其价值不仅体现于中医药领域,更成为地方文化认同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岐伯作为《黄帝内经》核心对话者,被尊为“华夏中医始祖”,其提出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等养生原则,构成《黄帝内经》核心思想,至今指导中医临床与现代健康管理。金台区金台观道教养生文化形成于元末明初,其核心人物道教宗师张三丰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主张“性命双修”,强调“清静无为”与“三教合一”,形成以太极拳为载体、内丹修炼为核心的养生理念。金台观道教养生文化融合自然环境、宗教哲学与武术养生,不仅塑造了地方文化特色,更为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康养产业发展提供思想文化支撑。

二、宝鸡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践探索

(一) 宝鸡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取得的实践成效

“十四五”以来,宝鸡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论述,推行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协同发展,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发展重要驱动力,为传承中华文脉、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是挖掘成果丰硕,让文物说话。宝鸡市文物系统在让文物说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周原遗址、秦雍城遗址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并启动周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秦雍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24年6月宝鸡市启动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截至12月底,完成了麟游、岐山、扶风、眉县、太白、凤县、陇县、千阳等8个县的实地调查工作,共普查文物点2539处,其中,复核三普文物点2291处,新发现文物点248处,完成了74%的实地调查任务。开展周原遗址、秦公陵园37号墓、魏家崖遗址、下站遗址和凤县梁鹿坪遗址等主动性考古发掘5项,魏家崖遗址被基本确认为秦文公所居都邑“汧渭之会”,实证了宝鸡2780余年建城史,被评为2024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

二是利用文物交流展览,让历史说话。先后举办“金文铭周秦——宝鸡青铜器铭文临摹创作书法展”等5个临时展览,在南京、上海、广州等8个城市举办了宝鸡文物展,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12件馆藏文物亮相法国、澳门,全市9家博物馆的252件文物先后参与了国内外26个重要展览。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碰撞·交流·融合——丝绸之路上的宝鸡与吐鲁番”展和法门寺博物馆“宁静的辉煌——法门寺历史文化陈列”展荣获陕西省第二届(2021—2023年度)博物馆优秀展览评选优秀奖。开展“文化遗产日”“非遗购物节”等活动,推动非遗进社区、进校园,增强公众文化认同感。通过在文物展览交流中让历史说话,以史为鉴,不断增强本土文化自豪感。

三是高科技赋能文物保护,让文化说话。宝鸡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据不完全统计,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已达三万多件,国宝级别的有四件。2024年宝鸡对青铜器博物院基本陈列——青铜铸文明进行了提升改造,于12月30日试开展,共展出文物1153件/套。新展览使用防震展柜、低反射玻璃、专业灯具,采用OLED屏、360度影像、全息成像等多媒体展示手段,提高了文物保护水平,增强了互动性和沉浸体验感。构建“宝鸡市文物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实现3000余处文物点数字化管理;推进“互联网+文物”工程,青铜器博物院建立线上线下融合传播体系,开展“云游宝鸡”等宣传营销,线上访问量超千万次。此外,利用数字化技术对周原、秦雍城遗址实施智慧化管控,提升了安防水平。

(二) 宝鸡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存在的主要短板

“十四五”期间,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宝鸡市在挖掘、保护、传承、传播上狠下功夫,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对于持续推进“一四五十”战略要求而言,仍然存在一些短板与弱项。

一是保护利用规划存在缺失。近年来,在城市建设中尚未准确把握建设与保护的关系。宝鸡市周文化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未能充分平衡建设需求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存在大量占用耕地开展周城相关建设的情况。此外,毗邻的古迹周公庙在资源整合与开发利用方面亦未得到合理规划,未能充分发挥其文化联动价值。在城市更新建设中,存在缺乏全局系统思维、规划重短期效益轻长远统筹、各实施主体协同不足等问题,且此类现象在不同县区镇街普遍存在。

二是前瞻性保护措施较少。尽管宝鸡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一些成绩,但在文化遗产传承中却屡现断层、脉络断裂的现象。年轻人保护文化遗产意识薄弱、参与度偏低的现象。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仍依赖口头传递的传统模式。与此同时,城市建设进程中出现随意拆除地标文化遗产的情况。部分地方及文化机构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上还存在推进滞后的问题。

三是保护利用创新性不足。文化资源挖掘深度不足,产业发展限于浅层次观赏,产业链条短且拓展延伸不够。文化遗产转化创新虽融入现代设计元素,但多数文创产品工艺粗糙,未深入挖掘文物历史语境和文化内核,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仍显不足。以何尊为例,其作为“中国”一词最早实物载体的核心文化价值未被充分挖掘,错失传递文明标识的重要契机。文创产品同质化严重,如“凤凰于飞”胸针、周礼系列茶具、青铜器纹饰桌垫等,多采用标准化批量生产模式,缺乏差异化创意表达。

四是文化遗产品牌影响力不强。宝鸡市文化遗产品牌数量居陕西省首位,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遗产项目有限。当前遗址保护工作以静态守护为主,多数项目仍停留于大众化浅层次游览模

式。文化遗址讲解多采用标准化流程,缺乏差异化叙事设计,遗产价值未能有效地转化为文化辐射力与经济效能,国际化文化遗产数量有限,品牌未能做大做强。

五是管理体制机制尚不健全。虽然宝鸡市已出台《宝鸡市周原遗址保护条例》等法规文件,从宏观上对周原遗址保护作出制度性安排,但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法规体系尚未实现对岐山、扶风文化遗产的精准保护,地方特色保护条款缺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停留在传承实践层面,系统性法规体系尚未形成。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历史、考古、地质、化学、生物、文物修复等多领域,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多学科技术人才^[7]。但当前相关专业人才数量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同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执法力量薄弱,专业化执法队伍建设滞后,公众参与意识不足,难以形成保护合力。

三、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的实践路径

2024年9月,习近平到陕西省宝鸡市考察调研,在察看青铜器博物院“镇院之宝”何尊时强调,中华文明5000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8]。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需从管理体制、产业融合与科技赋能等多维度推进,使其成为传承中华文脉、促进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

(一) 规划先行,建设与保护并举

坚持做好顶层设计,始终把文化强市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性目标。系统梳理宝鸡文化遗产存量,以五年为周期制定宝鸡文化遗产发展规划,明确远景方向和近期目标。一要统筹规划,突出特色。在城市的更新建设中,对文物遗产保护利用要做好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规划设计,以长远眼光、专业眼光开展基层文化遗产建设工作。二要人人保护,人人受益。在文物遗产保护中,需强化全民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好文物遗产。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传承人应

树立全局观,在积极实践中不断培养青年传承力量。建议相关部门将作出特殊、重大贡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纳入正式编制管理。

(二) 挖掘价值,以文兴业促发展

在历史长河里,文化遗产如同散落在宝鸡的珍珠,承载着不同时代宝鸡人的智慧、情感、记忆。一要提炼符号价值。打造独具宝鸡特色的文化符号IP,将其与现代生活场景巧妙融合,延伸产业链,形成“符号独特、产品多元、体验消费”的闭环发展模式。构建全产业链开发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二要挖掘会展价值。借助重大节日、节气与会展活动,由政府牵头制定《宝鸡市文化符号整合发展规划》,借鉴周文化旅游节经验,整合炎帝祭祀、青铜器学术论坛、社火大赛为“宝鸡中华文明周”,同时联合高校与青铜器博物院成立中华文明研究基因中心,系统梳理炎帝文化、青铜器礼制、社火民俗的内在联系,出版《宝鸡文化符号集成》系列丛书。三要拓展研学体验。作为炎帝故里,宝鸡农耕文化遗产优势突出。可组织青少年参与农耕实践,从播种到收获体悟先祖智慧勤劳;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扶持,通过线上线下学习展现其魅力与古人匠心。依托文化遗址保护传承,打造各类科普活动、开发课程体系,丰富研学载体和形式,打造相关文化遗产研学旅行基地^[9],推动文旅商融合发展。

(三) 整合资源,做优文化遗产品牌

宝鸡文化遗产品牌类型分散,关键要整合其核心品牌。一要整合历史脉络。围绕“中华文明之源·宝鸡文化基因”核心定位,构建从农耕文明到礼乐文化再到民间传承的文明发展链条。二要整合精神内核。提炼“德礼交融·生生不息”文化基因。以炎帝尝百草治病之“德”、何尊铭文“德”字的系统化道德观念为核心,在炎帝陵设置德政讲堂,结合青铜器铭文讲解周代“敬天保民”思想,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举办“德礼宝鸡”特展,讲述炎帝为民传说与“德礼”传承演变。三要整合地方资源。以宝鸡青铜器为对外宣传名片。整合各县区青铜器壮大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同时彰显地方文化特

色。整合各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谋划建设宝鸡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全方位做强宝鸡文化遗产。

（四）科技赋能，激发强大发展潜力

科技是文化遗产守护者与传承创新转换器。一要推进数字化采集存档。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摄影、近景摄影等技术，对宝鸡文化遗产及各县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数字化存档，建立宝鸡市文化遗产数字化大平台，联动并持续完善各县区数字平台。二要注入创新元素。借助投影和三维动画技术，创造出新颖艺术形象，实现游客与千年遗产的跨时空互动；开发智能家居、教育玩具等产品，推动宝鸡文化遗产走进居民生活。三要利用科技拓展传播。推动大众利用 AI 短视频技术创作文物故事与非遗制作过程短视频，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传播；推动“文化+”与制造业、智能设备、网游、动漫等新业态深度融合，让静态展示升级为沉浸体验，以科技驱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

（五）多措并举，壮大专业人才队伍

人才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播的关键。一是重在培育。国家层面应重视文化遗产人才培养，加快科技文物人才队伍建设，设立专项基金或奖项，支持文物保护利用领域的科技创新^[10]。文化遗产地域性强，需培育热爱本土的非遗传承人，助力其潜心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搭建平台。建立从基层到省市县的文化遗产信息平台，实现与国家级平台信息互通；加强职业培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不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三是重在吸引。通过政策扶持，建立专业人才绿色通道和柔性人才引进等机制，充实文物单位对口专业人才。每年在西北大学、陕师大开展文物单位负责人岗位轮训，培养文博业务与管理兼具的复合型人才；吸纳在文化遗产领域造诣深厚的民间学者加入讲解员队伍，缓解专业人才短缺难题，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

（六）法治护航，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法治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挥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其通过构建制度框架、严格执法和加强监督，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根本保

障。一要完善立法。持续推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填补数字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红色文化遗产等新兴领域立法空白；加强宝鸡各区县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全过程的立法；实现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有法可依”。二要加大执法力度。对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综合运用罚款、刑罚等手段；针对跨国文物倒卖犯罪，加强跨国执法合作，共建打击和防文物犯罪长效机制，切实增强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三要健全监督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充分发挥“12359”文物违法举报热线作用，鼓励公众提供违法线索，形成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参与的协同监督格局。重点加强文物市场监管力度，提升市场主体守法经营意识与非法流通文物识别干预能力，降低文物盗卖流失风险。推动文物、住建、文旅、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组建专业执法队伍，形成文化遗产保护合力，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与利用。

【参考文献】

- [1] 本报评论部. 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N]. 人民日报, 2024-08-14 (05).
- [2]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J]. 求是, 2022 (14): 4-8.
- [3] 杨一苗. 陕西宝鸡建北首岭史前博物馆 [EB/OL]. 新华网, (2009-02-12). <http://big5.cctv.com/gate/big5/news.cctv.cn/china/20090212/100475.shtml>.
- [4] 杨曙明. 何尊：最早记录“中国”一词的青铜器 [N]. 内蒙古日报, 2018-11-19 (06).
- [5] 杨广亭. 宝鸡：何以为尊，我有“中国” [N]. 学习时报, 2024-12-27 (04).
- [6] [9] 刘坤, 李静茹, 仵永杰. 做好保护研究宣传阐释 讲好青铜器故事——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回访 [N]. 陕西日报, 2024-09-14 (02).
- [7] [10] 马嘉悦, 廖昕朔. 委员呼吁：让科技全领域赋能文化遗产保护 [N]. 人民政协报, 2024-10-11 (11).
- [8] 马陆镇, 王嘉雯. 赓续历史文脉 建设文化强国 [N]. 人民日报, 2024-09-26 (01).

责任编辑：李 蕾